

在中、日帝國勢力夾縫間的商業韌性： 南臺灣大海產雜貨商的崛起（1895-1941）*

林玉茹**

摘 要

本文以長崎泰益號所建構的臺南網絡中，與其交往最久、又是科舉家族弱房出身的王汝禎為研究對象，試圖分析其如何因應中、日帝國政經關係與全球化經濟的劇烈變動，並透過金義興號的營運發展、自身商人地位的變化，以及對現代化經營的積極學習，展現遊走於帝國勢力夾縫之間的殖民地商人韌性。

本文有幾點發現。首先，以出身「科甲之裔」自居，成為王汝禎的文化資本，不僅得以擴展在地臺商網絡，也獲得日商旭商店居中媒介，1910 年代成為臺南海產批發行與函館直接貿易的代表性商人。其次，臺灣海產雜貨商雖然最先透過長期控制日本海產出口的神戶和長崎華商進行與日本的直接貿易，然而 1910 年代已經日本化的臺商，不僅可以直接和日本出口商交易，甚至到神戶設立公司，進一步建構臺南、基隆以及神戶的貿易網絡，也因此降低對在日華商的依賴或在臺日商的競爭優勢。第三，金義興號退出泰益號臺南網絡的原因，一方面是全球及日本帝國國內進口海產來源多元化，導致對泰益號的需求選擇彈性極高；另一方面，則是長崎航運劣勢和泰益號組織的惰性，而讓該地海產缺乏價格和品質的競爭力。第四，相對於 1920 年代泰益號進入營業消退期，臺南商人之間建構出來的貿易網絡，以及因應安平港和高雄港的消長，共同合資在高雄港設立從事跨國進出口貿易的利興公司，反而奠定王汝禎作為南臺灣巨商的地位。由此突顯臺商比泰益號更能迎合變動劇烈的時局，呈現跨足華商和日商網絡以及自創臺商網絡的商業韌性。

關鍵詞：金義興、王汝禎、泰益號、神戶、函館、海產

* 本文為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研究成果，計畫編號：AS-TP-114-H01。審查人提供具體而詳盡的意見，得以減少錯誤；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主任王麗蕉博士及館員提供檔案和相關資訊，林昀叡、謝宜憲、簡律綱、徐嘉陽以及劉芳亭等助理協助蒐集資料，謹此致謝。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合聘教授
來稿日期：2025 年 7 月 10 日；通過刊登：2025 年 12 月 2 日。

- 一、前言
 - 二、清、日跨政權下臺南大人廟街的王家
 - 三、由地方小雜貨商到海陸產批發商
 - 四、南臺灣海陸產巨商
 - 五、結論
-

一、前言

眾所周知，涂照彥根據糖業資本發展，指出日本統治時期臺灣本地資本不敵日本資本而走向從屬化。¹ 這是針對砂糖製造及輸出的觀察，是否適用於其他產業，仍值得檢證。特別是陳來幸透過神戶貿易指出，在新興製造品上日本商人（以下簡稱日商）和華商產生激烈競爭，但在傳統海產的生產、集散及出口上，卻有明顯的合作和分工的關係。² 谷ヶ城秀吉也認為，海產是理解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臺灣與日本經濟關係的代表性商品。他以 1910-1930 年代北海道函館海產與臺灣的貿易為例指出，林滿紅僅從華商網絡觀察臺灣商人（以下簡稱臺商）的局限性，³ 認為第一次大戰至第二次大戰之間臺商是以殖民地商人的身分將華商網絡納入日本帝國網絡中，而成為日本帝國和東亞之間的中介和必要的存在，但 1930 年代之後卻因中、日關係的惡化，逐漸失去重要性，並被日魯漁業等日系資本家取代。⁴ 然而，谷ヶ城單以北海道及基隆謝裕記的觀察，卻忽略那些單向從島外進口海產雜貨的臺商，如同時期臺南與北海道直接貿易的金義興號（1902-1941）。

¹ 涂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の台湾》（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5），頁 395-398。

² 陳來幸，〈開港上海における貿易構造の変化と華商：砂糖と海産物を中心に〉，收於森時彦編，《長江流域社会の歴史景観》（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3），頁 9。

³ 由於在清、日跨政權轉換期認同問題複雜且會隨時間變化，本文所謂的華商和臺商主要從出身地來考量。

⁴ 谷ヶ城秀吉，《帝国日本の流通ネットワーク：流通機構の変容と市場の形成》（東京：日本経済評論社，2012），頁 109-140、113。

臺灣海產商是否必然被日商取代的論點，仍待進一步檢證。

其次，過去以來，眾多研究均強調作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如何在臺灣總督府的關稅及其他政策下，與中國斷絕貿易關係，而與殖民國日本建立極為密切的貿易圈。不過，如同谷ヶ城秀吉指出，第一次大戰之後臺灣與中國的經濟關係進入重編。許世融的研究，也發現 1895-1913 年之間，臺灣與中國的貿易量逐漸降到不及 10%，但第一次大戰到大正時期結束（1914-1926），卻以異常速度遞增，直至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才再度沒落。⁵ 另一方面，進入昭和時期，世界經濟大恐慌影響之下，1930 年代日本帝國圈內的經濟關係更為強化。⁶ 隨著日本帝國勢力的擴張，政府透過航運、冷凍設備、關稅、銀行等措施，促使臺灣與東北的貿易額也扶搖急升，甚至超過對華南的貿易額，⁷ 臺灣與中國的日軍占領區的貿易也持續增加，一直到終戰前一年。⁸ 進言之，日本統治期間，隨著時代環境的變遷，臺商不僅搖擺在中國與日本之間，特別是對於向來從兩地進口海產的貿易商而言，他們如何面對來自日商的競爭，如何周旋在中、日帝國政經關係變動的夾縫之間以及全球化下的貿易場域中，追求最大利益？

本文即以來自科舉家族、鼎鼎有名的王育德（1924-1985）和二二八受難者王育霖（1919-1947）的父親王汝禎（1880-1953）及其商號金義興號為研究對象，探究位處弱房的王汝禎如何在跨政權下白手開闢商業的一片天，實現向上流動（upward mobility）。亦即，在晚清到日本殖民統治的變局之下，王汝禎如何得以成立金義興號？如何在詭譎多變的國際局勢中，由地方性的小雜貨商，變成南臺灣「巨商」？他又如何把海產從城市行銷到內陸街村，以及建構和擴張東亞的貿易網絡，不斷拓展商品邊界。

⁵ 谷ヶ城秀吉，《帝國日本の流通ネットワーク：流通機構の変容と市場の形成》，頁 38；許世融，〈關稅與兩岸貿易 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6），頁 13-16。

⁶ 堀和生、中村哲編著，《日本資本主義與臺灣・朝鮮：帝國主義下的經濟變動》（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0），頁 1-25。

⁷ 林滿紅，〈臺灣與東北間的貿易（1932-194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24 下（1995 年 6 月），頁 695；林滿紅著、河原林直人譯，〈日本の海運力と「僑郷」の紐帶：一九三〇年代の台湾—滿洲間貿易を中心に〉，收於松浦正孝編著，《昭和・アジア主義の実像：帝国日本と台湾・「南洋」・「南支那」》（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7），頁 344、363。

⁸ 許世融，〈關稅與兩岸貿易 1895-1945〉，頁 37-42、244-246。

王汝禎經營的金義興號，於1907-1938年之間與擁有橫跨東亞貿易網路的長崎泰益號陳世望家貿易和通信，⁹是當時臺南商號中通信最久、發信次多的商號。在「長崎泰益號文書」中留存383封書信，¹⁰和振承號、永茂號都是長崎泰益號臺南網絡中的重要商號。¹¹朱德蘭在討論長崎泰益號與臺南商號的貿易中，曾經大概交代其簡歷，並整理了1909-1923年泰益號運到金義興號的海產品及臺南四家商號貿易額的變化（1917-1933），其中1917年和1922年金義興號均占第一，呈現其重要性。¹²不過，他忽略了通信最多的振承號的地位，且相對於1928年泰益號開始走向營業衰退期，¹³並未注意王汝禎反而隨著時代局勢的變遷，而由學徒變成臺南巨商，以及為何退出泰益號貿易網絡。本文使用長崎泰益號文書、戶籍資料、報紙、王育德自傳¹⁴以及旅券等一手史料，重建王汝禎的家世。其次，試圖分析夾雜在中、日帝國勢力和全球化經濟變動之間，金義興號營運的發展、王汝禎商人地位的變化以及他如何迎合新時代，積極學習經營的現代化，而展現殖民統治下臺商的商業韌性。

⁹ 長崎泰益號是1901年由來自金門的陳國樑、陳世望父子在長崎新地街25號成立，貿易網絡北到海參崴，南及曼谷，至今已經有不少專書和文章探究這個商號。詳見朱德蘭，《〈長崎華商：泰昌號、泰益號貿易史（1862-1940）〉》（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6），頁5-14。

¹⁰ 1990年代市川信愛和朱德蘭等學者的初步整理中（據日本長崎市立博物館影印未刊本），金義興號文書有330件，是臺南商號中通信最多的商號。但移交原件給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整理之後，有383件，振承號則是由117件變成416件；通信時間，振承號應是1904-1930年，金義興號是1907-1938年。參見〈臺南地區商號索引表〉，收於賴澤涵、朱德蘭、市川信愛編，《長崎華商泰益號關係商業書簡資料集 臺南地區商號：1901-1938年》（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2），第46冊，無頁碼。

¹¹ 振承號位於竹仔街，代表人是嚴水承，經營和洋雜貨、海產罐頭生意。不僅較早與泰益號聯繫，且由金義興號文書也可以看出振承號在泰益號的臺南網絡中具有重要位置。不過，朱德蘭的研究中則忽略其重要性。永茂號如朱德蘭指出，與金義興都是重要商號之一。參見辛德蘭（即朱德蘭，為避免混淆，正文統一使用朱德蘭），〈長崎華商泰益號與臺南地區商號的貿易活動（1901-1938）〉，收於海洋史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港口城市與貿易網絡》（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2），頁327。

¹² 辛德蘭，〈長崎華商泰益號與臺南地區商號的貿易活動（1901-1938）〉，頁296、301-303。

¹³ 許紫芬透過帳簿將長崎泰益號的營運分成五期。朱德蘭則區分成四期，但都指出1928年泰益號走向衰退期，甚至出現巨額虧損。參見許紫芬，《近代中國商人的經營與帳簿：長崎華商經營史的研究》（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64；辛德蘭，〈長崎華商泰益號與臺南地區商號的貿易活動（1901-1938）〉，頁294。

¹⁴ 王育德、王明理著，吳瑞雲、邱振瑞譯，《台灣獨立運動啟蒙者：王育德自傳暨補記》（臺北：前衛出版社，2018）。不過，書中有些年代與〈王汝禎戶籍謄本〉或一手史料有些差距，仍以後者為本。

二、清、日跨政權下臺南大人廟街的王家

根據現存史料，王汝禎家族只能追溯到同治、光緒年間的祖孫三代。第一代王宗元（?-1875）與顏滿若生五子。長男王藍玉（1842-1906），於1865年考上秀才，¹⁵ 1873年鄉試中舉，1889年會試落第後，經大挑列入二等，以教職任用，12月即擔任臺灣縣教諭，1890年為臺北府學教授，1894年卸任。¹⁶ 另一方面，五子王藍石（1854-?），9歲拜大哥王藍玉為師，讀詩書，1877年入府學為秀才，1882年中舉。1893年，出任彰化縣儒學教諭，又兼臺灣縣學訓導一年多。¹⁷ 很明顯地，從1865年王藍玉考上秀才，王家已經朝向科舉家族之路發展。至1880年代，一家兩舉人，成為道地的紳士之家，更開始承擔來自官方或地方社會的任務。

1880年，永康鯉魚潭浮覆，臺灣道張夢元派任紳士招佃人開墾，以作為蓬壺書院膏伙、巡檢津貼的經費。生員王承暉（王藍玉長子）即以董事王輝記身分承辦，¹⁸ 前後經過多任道臺任命，直至1895年清朝政權結束。¹⁹ 另一方面，臺灣建省之後，1886年，劉銘傳新政進行清賦事業，臺南府設立清丈總局，選派公正紳士偕同清丈，王藍玉也是16名成員之一。²⁰ 1892年，王藍玉與蔡國琳又共同擔任開臺延平郡王祠董事，負責督導佃人開墾大西門外軍工廠地魚塢。²¹ 王藍石則曾經發起在小東門內蓋小觀音亭，奉祀觀音菩薩和文衡聖帝，並邀集同人組「蔚文字局」，設在大東門內彌陀寺，每月出金雇工撿拾和敬惜字紙。²² 1880年代起，王家已經以紳士身分承擔不少臺灣道、府衙門委託，或是維持科舉仕紳身分

¹⁵ 為避免混淆，且呈現先後時間的關聯性，本文統一使用西元紀年。

¹⁶ 他擔任臺灣縣學訓導時間，《臺灣通志》寫作1891年代理。參見〈王藍玉戶籍謄本〉（臺南：中西戶政事務所藏）；不著撰人、周憲文編輯，《臺灣通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130種，1962），頁363；〈王藍玉履歷書〉，《王藍玉台南師範學校教務囑託採用ノ件（元臺南縣）》（1905年），「臺灣總督府檔案」（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9560030。

¹⁷ 〈王藍石履歷書〉，《臺南縣王藍石外十四名臺北縣洪以南外十九名紳章付與》（1897年），「臺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00126021。

¹⁸ 透過〈王藍玉戶籍謄本〉可見，王承暉是王藍玉長子，但1905年戶口調查時已經過世。

¹⁹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私法物權編》（文叢第150種，1963），頁462。

²⁰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私法物權篇》，頁39。

²¹ 〈開山神社開墾地業主權認定ノ件〉（1912年），「臺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02024013。

²² 〈王藍石履歷書〉，典藏號：00000126021。

的各項任務，儼然是府城大東門內重要的科舉家族。

王家的原居地不詳，極可能在府城東門外。²³ 1878年，王家以王輝記名義在大人廟街租屋居住。1882年，王藍石中舉之後，五兄弟分家，仍聚族而居。1885年，王輝記進一步向原屋主買下住屋和店屋共3棟，包括左右護龍14間，水井1口及東南邊空地。²⁴ 王輝記顯然是家族公號，在大人廟街買下房屋，也正式變身為大人廟街王家。然而，1895年4月因中、日馬關條約，臺灣割讓給日本，重要紳商紛紛內渡。²⁵ 5月、7月王藍玉和王藍石先後攜帶家眷回廈門暫居避難，王藍石一行甚至包含71歲年邁的母親顏滿若。早在1897年5月兩年的國籍選擇權截止之前，²⁶ 1896年6月，王藍石一家最早回到臺南，王藍玉家則是1900年9月遷回。他們內渡中國期間，在大人廟的家屋卻因空屋被標封，由憲兵屯所和日商占住。經過王藍石多次的據理力爭，1901年10月才返還。²⁷

回到臺南的王藍石，於1897年4月獲得總督府授予紳章，²⁸ 又於1900年出任臺南市第一區街長，3年後辭職，成為私塾老師。²⁹ 王藍玉則於1904年擔任臺灣總督府師範學校囑託，之後任臺灣舊慣調查會囑託，直至1906年離世。³⁰ 他們的子孫則必須面臨新出路的選擇。王藍玉的長孫王平戎（1884-？）擔任保甲書記，次孫王文瀾（1885-？）是藥種商。王藍石的兒子王傳薪（1893-？）曾入國

²³ 以王家所擔任的工作和活動範圍來看，極可能來自府城東門外的仁德地區。

²⁴ 《王藍石ヨリ官有家屋下戻願ノ件（元臺南縣）》（1898年），「臺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09875015。

²⁵ 臺灣紳商內渡又以臺南地區最多。參見林玉茹，〈跨國貿易與文化仲介：跨政權下臺南第一富紳王雪農的出現（1880-1905）〉，《臺灣史研究》（臺北）27：4（2020年12月），頁44-45。

²⁶ 1895年5月起，日本政府給新納入帝國領土的臺灣和澎湖島居民兩年的國籍選擇權。參見淺野豐美，〈日本帝国における台湾「本島人」と「清国人」の狭間：国籍選択権と台湾法制〉，《現代台湾研究》（吹田）19（2000年3月），頁70-73。

²⁷ 《大人廟街乙九號及九號ノ二王藍石ヨリ開封願ノ件（元臺南縣）》（1897年），「臺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09872024，頁149-163；《王藍石ヨリ官有家屋下戻願ノ件（元臺南縣）》（1898年），「臺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09875015；《王藍玉台南師範學校教務囑託採用ノ件（元臺南縣）》（1905年），「臺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09560030。

²⁸ 《臺南縣王藍石外十四名臺北縣洪以南外十九名へ紳章付與》（1897年），「臺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00126021。1897年4月，臺灣總督府為了籠絡臺灣紳商，而授予具有名望、學識以及資產的人紳章。參見楊永彬，〈臺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權的關係：1895年-1905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頁117。

²⁹ 鷹取田一郎編，《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頁293；〈王藍石戶籍謄本〉（臺南：中西戶政事務所藏）。

³⁰ 《師範學校長山崎勇外十三名昇等昇級ノ件》（1904年），「臺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01022039；〈王藍玉戶籍謄本〉。

語學校師範部，參與廈門電燈會社的經營。父子兩人於 1897 年 10 月和 1913 年 1 月兩度至廈門探親或取回祖先遺骨，1913 年王傳薪已經搬至臺北南門街居住。³¹ 日本統治初期，王藍玉顯然仍承接殖民政府的職務，而王藍石卻最後選擇退隱。子孫則必須開始往地方公務或新事業邁進，甚至往外地發展。

相對於舉人強房內渡又遷回臺灣的狀況，位處弱房的王汝禎，父親王藍峰（?-1894），母親李惜則早逝。1884 年，父親又娶外新街吳俗（1867-1932）為繼妻。1894 年，王藍峰過世，留下一子二女及 100 圓債務。身為長子的王汝禎，只能將甫出生的小妹王粉（1894-?）送給岳帝廟街陳家當養女，又一再請求後母能夠守住王家的名譽與節操，不要改嫁，而把收入都交給她掌管。後母和他的長女王祥（1888-?）則做些假花、刺繡的副業，或幫人清洗纏足布的卑賤工作。³² 由此可見，王汝禎家在日本殖民前後生活的窘境，以及儘管來自弱房，從小家族聚族而居，一族三代均被尊稱為「舍」，³³ 耳濡目染之下，養成他的科舉門邸自覺及婦女守貞節烈的傳統意識。³⁴ 直至 1931 年編纂的《臺南州名士錄》，仍記錄他是「科甲之裔」以及他繼母的「節婦」德行，³⁵ 即可為證。

父親過世後，14 歲的王汝禎只能輟學，放棄家學淵源，並透過姻親關係到元會境街和源號當學徒，學習經商。和源號是由劉瑞山和四弟劉錫五共同創立，最先開張「業鋸店」（營業不詳），店名和發。1885 年，經營雜貨、爆竹和砂糖生意，改名和源。1897 年，進行海產進口，及米、砂糖的仲介買賣和出口，事業大興，1919 年資產已達 30 萬圓。劉瑞山的母親李朗即是王汝禎母親李惜的姊姊，

³¹ 祖先遺骨應該是指王藍石母親。由此可見，王藍石於 1913 年確認在臺灣落地生根。參見〈王藍石戶籍謄本〉；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92），頁 187；〈1898 年 1-3 月外國行旅券下付及返納表〉、〈1913 年 1-3 月外國旅券下付表〉、〈1913 年 1-12 月外國旅券返納表〉，《臺灣總督府旅券下付及返納表》（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識別號：T1011_01_004、T1011_03_054、T1011_03_058。

³² 〈王汝禎戶籍謄本〉（臺南：中西戶政事務所藏）；王育德、王明理著，吳瑞雲、邱振瑞譯，《台灣獨立運動啟蒙者：王育德自傳暨補記》，頁 19-20。

³³ 「舍」是對榮貴子弟的尊稱。王育德自稱因恩典及三代，因此小時候都被女傭敬稱舍。參見王育德、王明理著，吳瑞雲、邱振瑞譯，《台灣獨立運動啟蒙者：王育德自傳暨補記》，頁 22。

³⁴ 明清時期科舉仕紳家族中的女性有貞節牌坊的意識和習慣。詳見衣若蘭，《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費絲言，《由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節觀念的嚴格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8），頁 224-228。

³⁵ 柯萬榮，《臺南州名士錄》（臺南：臺南州名士錄編纂局，1931），頁 37。

在姨表兄弟關係下，王汝禎進入和源號，最初月薪 2 圓。³⁶

在和源號工作 7 年，1901 年 12 月，王汝禎娶總爺街洪銓為妻，結婚費用還是向五叔王藍石借，才半年就被索討，只好典當洪銓的首飾還款。之後，同和行以和源號雙倍的薪水聘雇王汝禎。8 個月後，王汝禎跟行主借價值 600 圓的煙絲 10 擔，作為日常雜貨商的資本，用扁擔挑著到處叫賣。³⁷ 叫賣小行商王汝禎的出現，進一步為 1902 年 8 月在大人廟街開張金義興號奠定根基。

由上可見，王汝禎家族原來可能住居在府城東門外，1870 年代王藍玉中舉之後，才進入府城內的大人廟街居住，1880 年代已經是城東坊的紳士之家。然而，乙未割臺，兩個舉人家庭也搭上內渡中國的風潮，卻又先後回到臺南，擔任殖民地基層公職或最後退隱。相對地，位處弱房的王汝禎只能輟學，放棄家學淵源，並透過姨表姻親關係學習經商，但也因而確立清、日跨政權之下的從商之路。

三、由地方小雜貨商到海陸產批發商

王汝禎於 1902 年 8 月在大人廟街 15 號開張金義興號，最初僅是小雜貨店，至 1939 年仍有營業稅紀錄（表 1）。1941 年 5 月，在戰時國家總動員之下，日本施行貿易統制令，³⁸ 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1942 年 6 月又施行「企業整備令」，整合臺灣中小商工業者，推動轉業和廢業，³⁹ 金義興號只好結束營業。⁴⁰ 這段期間，除 1928 年與神戶怡利公司蔡炳煌（蔡炎，1881-？）共同在高雄創立利興公司之外，金義興號店面曾經搬遷 3 次（圖 1），反映營業規模的不斷擴張。因此，

³⁶ 臺南新報社編，《南部臺灣紳士錄》（臺南：該社，1907），頁 56；杉野嘉助，《臺灣商工十年史》（臺北：杉野嘉助，1919），頁 563-564；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臺南：劉克全，2004），頁 11、254；王育德、王明理著，吳瑞雲、邱振瑞譯，《台灣獨立運動啟蒙者：王育德自傳暨補記》，頁 15-16。

³⁷ 〈王汝禎戶籍謄本〉；王育德、王明理著，吳瑞雲、邱振瑞譯，《台灣獨立運動啟蒙者：王育德自傳暨補記》，頁 20-22。

³⁸ 許世融，〈戰時體制下的兩岸貿易（1941-1945）〉，《國史館館刊》（臺北）25（2010 年 9 月），頁 93-96。

³⁹ 洪紹洋，《企業、產業與戰爭動員：現代臺灣經濟體系的建立（1910-1950）》（新北：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2），頁 23。

⁴⁰ 王育德、王明理著，吳瑞雲、邱振瑞譯，《台灣獨立運動啟蒙者：王育德自傳暨補記》，頁 14。

以下以店面變化做分期，觀察王汝禎事業的變化。本節先討論大人廟街和元會境街時期，他如何由地方小雜貨商變成海陸產批發商。

表 1 臺南金義興號王汝禎營業稅稅額表

年度	商號／個人名稱	地址	稅額（圓）	排名
1916	王汝禎	臺南乙七二六番地	376	5
1917	王汝禎	臺南市高砂町二丁目	506	3
1919	王汝禎	臺南市高砂町二丁目	111	17
1921	王汝禎	本町二丁目六六番地	1296	3
1922	王汝禎	本町二丁目六六番地	1489	1
1925	王汝禎	臺南市本町二丁目	408	1
1927	金義興	本町二丁目六二番地	515.10	3
1929	王汝禎	本町二丁目	515.10	3
1930	金義興	臺南市本町二丁目自六二至六六番地	592	2
1931	金義興	本町二丁目	700 圓以下	2
1932	王汝禎	臺南本町二丁目六二番地	375	2
1932	王汝禎	高雄新濱町一丁目六十番地	614	1
1932	利興公司	高雄新濱町一丁目六十番地	42	4
1934	王汝禎	臺南本町二丁目六二番地	375	1
1934	王汝禎	高雄新濱町一丁目六十番地	614	1
1934	利興公司	高雄新濱町一丁目六十番地	42	4
1939	王汝禎	臺南本町二丁目六二番地	375	1
1939	王汝禎	高雄新濱町一丁目六十番地	614	1
1939	利興公司	高雄新濱町一丁目六十番地	42	4

說明：林昀叡製表，1932、1934、1939 三個年度雖基於不同來源的史料，但稅額相同。

資料來源：交詢社編，《日本紳士錄 21 版》（東京：該社，1916），朝鮮臺灣關東州，頁 116-135；交詢社編，《日本紳士錄 22 版》（東京：該社，1917），朝鮮臺灣關東州樺太，頁 89-104；交詢社編，《日本紳士錄 23 版》（東京：該社，1919），臺南打狗之部，頁 1-12；交詢社編，《日本紳士錄 26 版》（東京：該社，1921），臺南之部，頁 1-14；交詢社編，《日本紳士錄 27 版》（東京：該社，1922），臺南之部，頁 1-11；大日本商工會編，《大日本商工錄：公認 大正拾四年版》（東京：該會，1925），臺灣，頁 45；臺灣物產協會編，《昭和二年臺灣商工名錄》（臺北：該會，1927），頁 399-400；博信社編，《大日本帝國商工信用錄 昭和 4 年》（東京：該社，1929），臺灣，頁 26-30；大日本商工會編，《大日本商工錄 昭和五年版》（東京：該會，1930），臺灣，頁 144-145；大日本實業商工會編，《大日本實業商工錄 昭和 6 年版 臺灣》（大阪：該會，1932），臺南州，頁 3-4；帝國商工會編，《帝國商工錄：全國版分冊 昭和 7 年度 臺灣版》（大阪：該會，1932），頁 101；帝國商工會編，《帝國商工錄：分冊 昭和 9 年度版 廣島縣、山口縣、鳥取縣、島根縣、臺灣》（大阪：該會，1934），頁 101；帝國商工會編，《帝國商工信用錄 昭和 14 年度版 臺灣》（大阪：該會，1939），頁 73。



圖 1 1902-1941 年金義興號店址的變化

說明：林昀叡繪製

（一）籤商到海產雜貨批發零售商：大人廟街的金義興號 （1902.8-1910.3）

金義興號的創立時間，說法不一，但由 1902 年 8 月王汝禎從大人廟街 18 號到 15 號「寄留」，⁴¹ 又雇用來自馬公廟街的張摸來看，⁴² 應是此時租店面開張雜貨店，生意興隆，而還清所有欠款。⁴³ 1903-1904 年之間，王汝禎先後聘兩位雇人，卻都待不久。1904 年 10 月，再雇用鞋街的翁鑑澄做雜役，1905 年來自澎湖的呂傑為記帳、岳帝廟街蔡天恩擔任雜役，以及馬公廟街的陳玉明做查某嫗（婢

⁴¹ 日治時期民眾於本籍地外居住達 90 日者，須辦理寄留登記。

⁴² 由於王藍石住在大人廟街 16 號，15 號可能是王輝記購買家屋三棟中的店鋪。參見〈王藍石戶籍謄本〉；〈王汝禎戶籍謄本〉。

⁴³ 王育德、王明理著，吳瑞雲、邱振瑞譯，《台灣獨立運動啟蒙者：王育德自傳暨補記》，頁 21。

女）。⁴⁴ 之後，雖然雇人有所變動，但大概維持 1 位記帳，3 位雜役以及 1 位婢女的規模，而且除了府城本地人之外，大多來自澎湖。有能力聘雇專業的帳房和婢女，顯現 1905 年金義興號已經奠定道地餚商的規模。

從煙草行商起家的王汝禎，開張金義興號，最初經營爆竹雜貨販賣，營業稅僅 2.5 圓，不過一小店。之後，逐漸經手海產雜貨，特別是直接從日本移入商品，⁴⁵ 大發利市。⁴⁶ 王汝禎會經營海產，並從日本進口，大概與之前在和源號工作的經驗有關。

事實上，晚清臺灣已經開始消費來自日本的海產，但是大多透過在長崎和神戶的華商，將海產運到香港、廈門，再轉口到臺灣。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之後，直接移入更有利，特別是 1899 年施行關稅定率法，大稻埕商人首先委託在日本的華商作為代理店或支店，進口海產。1903 年，從香港轉口日本海產的狀況已經消失。⁴⁷ 與表哥劉瑞山始終保持緊密關係的王汝禎，自然看到這樣的商機。海產行起家的和源號更早於 1903 年已經與長崎泰益號聯繫，是臺南商號中第二家與泰益號實際交易海產的批發行。⁴⁸

然而，神戶華商向來在日本海產的輸出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1901 年以前更控制 87-97% 的輸出貿易。1902 年，華商進一步成立神戶海陸產物貿易同業者組合，不僅建構全方位的販賣網，更促使日本海產往神戶集散。⁴⁹ 另一方面，即

⁴⁴ 〈王汝禎戶籍謄本〉。

⁴⁵ 日治時期，臺灣對外國貿易稱輸出入，對日本貿易稱移出入。

⁴⁶ 〈王汝禎戶籍謄本〉；杉野嘉助，《臺灣商工十年史》，頁 563。

⁴⁷ 〈本島人間の商況 海產物商〉，《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12 月 9 日，第 2 版；林玉茹，〈進口導向：十九世紀臺灣海產的生產與消費〉，《臺灣史研究》25:1（2018 年 3 月），頁 36-100；林玉茹，〈貿易網絡的創新與挑戰：臺北大稻埕老源順號文書中的社會經濟活動樣態（1901 年至 1904 年）〉，收於林玉茹主編，《臺北大稻埕商業文書：陳源順號（一）（1901-1904）》（臺北：中央研究院臺史所，2023），頁 2-19。有關日治時期臺灣與香港的經濟關係，參見林滿紅，〈日本殖民時期臺灣與香港經濟關係的變化：亞洲與世界關係調動中之一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36（2001 年 12 月），頁 45-115。

⁴⁸ 〈臺南和源商行書信〉，《長崎泰益號文書》（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典藏號：T1001_11820-11824。由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所藏《長崎泰益號文書》部分未上架「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檔案館僅提供書信單件典藏號，且識別號涵蓋檔案館所藏該商號全部書信，例如〈臺南金義興商行書信〉（T1001_02_15_013）。識別號無法指稱單一書信，使用上有所局限，本文為行文方便，以下僅標注書信名稱、書信之典藏號、年代及日期。

⁴⁹ 陳來幸，〈開港上海における貿易構造の变化と華商：砂糖と海産物を中心に〉，頁 9、15-16。

使北美產的鮭魚也經神戶轉口到臺灣。⁵⁰ 基於此種情勢，長崎泰益號也讓陳世科（1875-1952）到神戶，在基隆和臺北大稻埕臺商支持下，於1902年設立泰益瑞記，進行神戶、長崎以及臺灣三地的海陸物產雜貨貿易，並介紹新客戶給長崎本店。⁵¹ 劉瑞山的和源號也在陳世科安排下與長崎的陳世望展開貿易。⁵² 也因此，王汝禎即最先經由神戶泰益號進口海產。⁵³

王汝禎進一步將進口網絡向長崎延伸是1907年。由於臺南鹹魚和魚乾需求年年增加，1907-1908年特別顯著，安平進口的海產增加1倍。⁵⁴ 或許受到海產需求景氣的影響，長崎海產夙負盛名，以及陳世科的大力推薦，該年與長崎泰益號新聯繫的臺南商號至少有20家。金義興號即是其中之一，且唯一與泰益號持續交易到1930年代，有8家卻僅發出1封信而已。⁵⁵

1907年，臺南金義興號與長崎泰益號的初接觸，是從舊曆丁未元旦寫賀柬、遞名片和店號開始。第二封信才根據泰益號拍發電報通知的美國舊金山鮑魚、十號蔘、煉乳以及罐頭等商品報價，請泰益號以郵局小包先寄來樣本，信封上已出現「臺南大人廟街籤商」印記。⁵⁶ 這是非常典型的臺商與泰益號初聯繫模式。從王汝禎感興趣的商品來看，更反映金義興號除了日本海產和藥材之外，已經進口和販售美國商品，呈現雜貨來源的多元化和全球化。

儘管王汝禎積極地想要透過長崎泰益號擴張海產進口網絡到北九州，但雙方5月第一筆丁香交易，就出現實際配運來的商品品質不僅很差，而且價格比從大阪恆昌號運給基隆和合號同樣貨色還要高許多。⁵⁷ 之後，在泰益號陳世望希望王

⁵⁰ 〈臺南之鹽魚商〉，《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11月7日，第3版。

⁵¹ 朱德蘭，《長崎華商：泰昌號、泰益號貿易史（1862-1940）》，頁239-241。

⁵² 〈臺南和源商行書信〉，典藏號：T1001_11820，1903年3月1日。

⁵³ 1908年4月，王汝禎寫給陳世望的信說，中面鮑魚品質不佳，本來要退貨，因為與神戶泰益號來往有年，所以才先打電報與陳世望溝通。參見林玉茹主編，《臺南商業文書：金義興號（一）（1907-1915）》（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5），頁84-87。

⁵⁴ 〈臺南之鹽魚商〉，《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11月7日，第3版。

⁵⁵ 〈臺南地區商號索引表〉，收於賴澤涵、朱德蘭、市川信愛編，《長崎華商泰益號關係商業書簡資料集 臺南地區商號：1901-1938年》，第46冊，無頁碼，並根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泰益號臺灣書信總清單〉校正所得。例如，1907年聯繫的商號由17家變成20家。永茂號事實上1906年已經先寫一封信，1907年才開始正式與泰益號交易。由書信可見，這些商號大半是陳世科介紹。

⁵⁶ 林玉茹主編，《臺南商業文書：金義興號（一）（1907-1915）》，頁34-38。

⁵⁷ 大阪恆昌號，位於西區本田三番町，行主林瑞鄉，營業項目是旅館兼批發業，雜貨和棉絲輸出以及羊毛油輸入，貿易對象是芝罘、天津。（品川仁三郎編，《世界輸出入大觀 大正七年》〔神戶：日華

汝禎不要駁回臺灣銀行的票據（駁票），並願意分攤損失前提下，雙方信件往返討價還價，直至 1908 年 3 月才落幕。期間，1907 年 7 月陳世望妹婿黃智海親自到臺南拜會王汝禎。⁵⁸ 泰益號成員到訪臺灣在地交易商號，似乎是一種例行模式，亦即透過實地訪查確認未來合作的可能性，特別是如同前述，此年臺南眾多商號與長崎陳家聯繫，更有必要來探查。之後，不同於臺北陳源順號作為泰益號與臺北商號的核心中介商號，而進行臺北和長崎雙向的米穀和海產雜貨交換關係，⁵⁹ 泰益號與金義興號正式建立單向從長崎進口海產雜貨的委託貿易型態，雙方關係則持續試探和磨合中。

1908 年 3 月，王汝禎指出中面魷魚在臺南銷售非常廣，即使其他商號有貨也會賣給金義興號，請泰益號能鼎力幫忙代買。金義興號的海產其實不僅銷售臺南，前述品質不良的丁香更銷往鳳山地區，甚至還轉賣給全島性或臺南的鹽乾魚大批發商金源益號，該號也自 1908 年和泰益號開始交易。⁶⁰ 由此可見，金義興號選擇魷魚作為經營重心，以及王汝禎展延長崎網絡以邁向海產批發商的企圖。

金義興號與泰益號的貿易從一開始卻因為海產品質不佳和價格太貴而問題重重。1908 年 4 月，泰益號運到臺南給各商號的海參崴鹽鯧，⁶¹ 又因包裝不佳、品質不良，加以剛好福岡丸、不動丸裝載鯪魚「堆積如山」，臺南最大的日本海產商旭商店（旭商會）也配運來鯪魚千餘箱，⁶² 市場行情大壞。王汝禎本來要跟泰益號打電報停止交易，但是因為是 1908 年新年以來初次託辦，所以決定「甘與同敗」。此時，卻有七、八成的臺南商號要求退貨或賠補，王汝禎還勸其中的

新報社，1918〕，頁 56）和合，又稱陳和合，店址在基隆新店街 83 號，店主陳魁，1907-1929 年之間與長崎泰益號聯繫。由此可見，金義興最初應透過基隆和合號進口海產，而進行比價。

⁵⁸ 林玉茹主編，《臺南商業文書：金義興號（一）（1907-1915）》，頁 39-53。

⁵⁹ 林玉茹，〈貿易網絡的創新與挑戰：臺北大稻埕老源順號文書中的社會經濟活動樣態（1901 年至 1904 年）〉，頁 2-19。

⁶⁰ 林玉茹主編，《臺南商業文書：金義興號（一）（1907-1915）》，頁 54-57、68-71。金源益號位於外新街，1910-1912 年仍是全臺或臺南鹽乾魚代表性移入商。參見《移入塩魚ニ關シ拓殖局一部長へ回答》（1910 年），「臺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05329012；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編，《本島ニ於ケル海產物：生産、輸、移出入》（臺北：該局，1914），頁 194。

⁶¹ 由震順記文書可見，這批鹽鯧來自海參崴。參見〈臺南震順記書信〉，《長崎泰益號文書》，識別號：T1001_02_16_066，掃描編號：T1001_13168，1908 年 4 月 9 日。

⁶² 1909 年，臺南市的鹹魚割店（批發行），臺灣人有 10 家，日本人只有外新街的旭商店、車豐、拇井三，買賣最多的只有旭商店而已。參見〈臺南之鹽魚商〉，《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 年 11 月 7 日，第 3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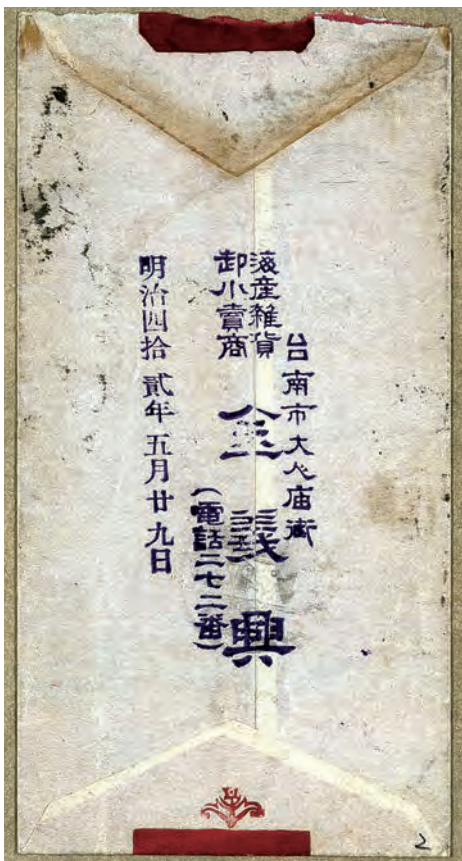


圖2 1909年5月「海產雜貨卸小賣商和電話號碼」印記

資料來源：〈臺南金義興商行書信〉，《長崎泰益號文書》，識別號：T1001_02_15_013。

成利號接受「生理造化」，⁶³ 沒有駁返海產。泰益號也把多運的魚貨改以「代兌」（委託代賣）方式交給金義興號販售。⁶⁴

鹽鯧事件中王汝禎展現的義氣，且為成利號和泰益號間的商品糾紛調解，獲得陳世望的信任，讓金義興號有機會邁向像臺北陳源順號一般，成為臺南網絡的核心中介商號。不過，王汝禎也表明，他可以接受因景氣變動導致的虧損，卻不願承擔因商品品質不好所造成的生意虧本。1909年，王汝禎又發現泰益號給他的中面魷魚品質，竟然比早在1904年與泰益號交易的振承號差。他原本打算退回票據，都在陳世望承諾賠補以及念及與神戶泰益號的交情而打住。⁶⁵

1908年以來，金義興號與泰益號的關係就是反覆地因商品品質和虧本分攤問題而爭論不斷，直至1909年交易金額始終不高。⁶⁶ 相對地，雖然王汝禎無法與陳世望建立如同臺北陳源順號般的信賴關係，但金義興號對泰益號的需求選擇彈性高，可以透過神戶和在地網絡取得海產，營業規

⁶³ 成利號位於竹仔街，代表人高獻瑞，1906-1919年之間與長崎泰易號交易。1918年更名為永捷利號。王汝禎則在竹仔街有別墅，應因地緣關係而熟識。參見〈臺南成利號書信〉，《長崎泰益號文書》，識別號：T1001_02_14_036；王育德、王明理著，吳瑞雲、邱振瑞譯，《台灣獨立運動啟蒙者：王育德自傳暨補記》，頁54。

⁶⁴ 林玉茹主編，《臺南商業文書：金義興號（一）（1907-1915）》，頁72-75；〈臺南震順記書信〉，掃描編號：T1001_13169。

⁶⁵ 林玉茹主編，《臺南商業文書：金義興號（一）（1907-1915）》，頁72-95。

⁶⁶ 1909年才147圓，與1905-1906年臺北陳源順號交易動輒幾千圓，規模微不足道。參見林玉茹主編，《臺南商業文書：金義興號（一）（1907-1915）》，頁96-98；林玉茹，〈日俄戰爭影響下臺北商人與日本的貿易：以大稻埕陳源順號為中心〉，《臺灣史研究》32:1（2025年3月），頁67-71。

模越來越大，1909 年之後不再自稱簞商，而是海產雜貨商。5 月，更進一步打字印刷為「海產雜貨卸小賣商」（批發零售商），並附電話號碼（圖 2）。另一方面，臺灣貿易商往往從島外聘用福建人擔任記帳，也負責商業聯絡書信。⁶⁷ 1908 年 12 月，王汝禎即先從福建晉江南門聘陳伍為雇人，⁶⁸ 以因應 1909 年展開的新氣象。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從簞商變成海產雜貨批發零售商之外，王汝禎已用電話。臺灣人從 1904 年開始使用電話，但直至 1930 年代臺灣人用戶始終占不到 30%，1909 年更低，僅有 231 戶，占 11%。⁶⁹ 金義興號顯然是少數擁有電話的商號，⁷⁰ 而能直接透過電話進行島內和島外的交易，⁷¹ 營業更繁盛。也因此，原來大人廟街的店面，已經不敷使用，1909 年他向劉瑞山買下在東嶽廟對面、元會境街的和源號舊店鋪，⁷² 自 1910 年開始進入第二階段元會境街的金義興號時期，向府城核心商業區靠近。

（二）全島性海陸產雜貨批發商：元會境街的金義興號（1910.3-1917.12）

1910 年代之後，臺灣專門的海產移入商已經很少，全島僅有三、五家，大多是兼營日用雜貨或其他商業。⁷³ 搬到元會境街的金義興號，也是如此，只是已經奠定批發商地位，轉身為海產雜貨批發商，不斷展延島內銷售和進口網絡，擴大商品邊界。除了從長崎進口海產之外，也從神戶持續移入海產和香菇。魷魚更是批發大宗，與其他海產行相比，毫不遜色。⁷⁴

⁶⁷ 林玉茹、劉序楓編，《鹿港郊商許志潮家與大陸的貿易文書（1895-1897）》（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6），頁 38-40。

⁶⁸ 〈王汝禎戶籍謄本〉。

⁶⁹ 曾立維，〈近代通訊與殖民地臺灣：以電報、電話為中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8），頁 261。

⁷⁰ 在泰益號的臺南網絡中，1909 年以前有電話的商號僅有和源、永茂、金長泰等三家。參見〈臺南地區商號索引表〉，收於賴澤涵、朱德蘭、市川信愛編，《長崎華商泰益號關係商業書簡資料集 臺南地區商號：1901-1938 年》，第 46 冊，無頁碼。

⁷¹ 1911 年 6 月來臺北的泰益號職員蔡承潤打電話給王汝禎，確定從臺北運來臺南賣的對洲魷魚底價。參見林玉茹主編，《臺南商業文書：金義興號（一）（1907-1915）》，頁 150-153。

⁷² 王育德、王明理著，吳瑞雲、邱振瑞譯，《台灣獨立運動啟蒙者：王育德自傳暨補記》，頁 30；劉克全，《永遠的劉瑞山》，頁 11。

⁷³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編，《本島ニ於ケル海產物：生産、輸、移出入》，頁 191。

⁷⁴ 林玉茹主編，《臺南商業文書：金義興號（一）（1907-1915）》，頁 110-116、120-123。



圖3 1911年5月義商標、
橢圓店章和營業項目

資料來源：〈臺南金義興商行書信〉，
識別號：T1001_02_15_013。

初出茅廬的王汝禎，選擇魷魚而不是鹹魚，展現他的獨具慧眼，得以避開與臺南在地臺商或日商的競爭。如前所述，儘管鹽、乾魚在臺南需求眾多，原來從日本或美國進口，大多經由臺商採辦，臺南鹹魚批發商也有10家，1909年卻逐漸失利，日商旭商店和車豐開始取得優勢。⁷⁵ 1910年，日本鹹魚海產行已經有10家，與臺商不相上下，即使金源益、和源、振承等鹹魚大批發商，⁷⁶ 都面臨巨大挑戰。福勝號和瑞珠號即如後面所述，先後倒閉或鉅額虧損，而退出長崎泰益號臺南網絡。

相對地，1911年5月，金義興號開始使用專用商標，⁷⁷ 6月又出現直至今日仍使用的橢圓形店章，更標明營業項目是海陸物產、食物罐頭、各種油類、雜貨紙類，也自稱「海陸物產輸入商」（圖3），增加陸產販賣。12月，營業項目變更為海陸物產、食物罐頭、蠟燭油類以及火柴雜貨，更由金義興號變成金義興商行。⁷⁸ 罐頭是金義興號的強項，現存赤貝、蠔螺罐頭貼紙，蠔螺還標明英文 Kingi & Co.，強調「貨真價低」。⁷⁹ 以魷魚和貝類罐頭為核心海產商品，並建立品牌，反

⁷⁵ 〈臺南之鹽魚商〉，《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11月7日，第3版；〈鹽魚半價〉，《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11月16日，第4版。

⁷⁶ 《移入塩魚ニ關シ拓殖局一部長へ回答》（1910年），「臺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05329012。

⁷⁷ 1911年5月，王汝禎以明信片通知陳世望，以後所託辦的商品改用金義興號義的商標，比較好認領貨品。參見林玉茹主編，《臺南商業文書：金義興號（一）（1907-1915）》，頁278-281。

⁷⁸ 林玉茹主編，《臺南商業文書：金義興號（一）（1907-1915）》，頁198-201。

⁷⁹ 罐頭貼紙藏於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出自〈臺南金義興號製蠔螺罐頭商標〉，「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網」，登錄號：2004.028.3168，網址：<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04.028.3168>，下載日期：2026年3月19日；〈臺南金義興號製赤貝罐頭商標〉，「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網」，登錄號：2004.028.3169，網址：<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04.028.3169>，下載日期：2026年3月19日。

而與競爭激烈的鹹魚有所區隔，而讓金義興號得以不斷擴展。

另一方面，從 17-19 世紀，長期是臺灣政治經濟中心的臺南市，海產移入額向來位居南臺灣第一，直至 1912 年安平港的鹽、乾魚移入也比打狗高出 5 倍。以移入地而言，神戶拔得頭籌，北海道函館則異軍突起，超越原來的下關、大阪、長崎以及門司等地，成為移入海產到臺灣的第二大港。⁸⁰ 函館和臺灣間的海產交易，事實上是從 1908 年開始，由旭商店古瀨大壽與函館的毛利甚兵衛交易，經由神戶日本人中間商移出鹽鱒魚、鹽沙丁魚。在函館海產大量移入的趨勢下，金義興商行於 1912 年與函館海產商直接交易，達 12,000 圓，⁸¹ 是臺南臺商最多且唯一列名者。很明顯地，海產批發販賣在臺南商機甚大，與函館的貿易最先由在臺南的日商開始。不過，由泰益號文書可見，王汝禎與古瀨大壽始終保持良好關係，⁸² 應透過旭商店介紹，而得以開展與函館的海產貿易，進一步奠定金義興在臺南、甚至全臺海產批發的地位。

根據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的調查，1912 年臺南有名的海產行有 19 家，其中臺商有 9 家。儘管日商數量已經超過臺商，但金義興號首度列名，而且在乾魚、乾蝦、干貝以及其他貝類，均在全島排名 10 名內，貝類更是獨占鰲頭。⁸³ 由此不僅突顯王汝禎的生意眼光，創業初期先往日商和臺商鮮少涉足的海產發展，更展現金義興號已經躍居全島性海產批發行之列。

1913 年 4 月，金義興號營業項目又新增委託販賣（圖 4），企圖進一步擴展跨國網絡。亦即招攬東北亞的海陸產出口商行，可以直接委託金義興號在臺南販售。8 月，在下關中利商店內的泰益號支店蔡承潤，即開始從下關配運海產到臺南，交由王汝禎代賣。⁸⁴

⁸⁰ 《移入塩魚二關シ拓殖局一部長へ回答》（1910 年），「臺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05329012；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編，《本島ニ於ケル海產物：生産、輸、移出入》，頁 155；谷ヶ城秀吉，《帝国日本の流通ネットワーク：流通機構の変容と市場の形成》，頁 120。

⁸¹ 谷ヶ城秀吉，《帝国日本の流通ネットワーク：流通機構の変容と市場の形成》，頁 116、表 4-4。

⁸² 1908 年，王汝禎甚至透過旭商店知道長崎泰益號配來的鹽鯉價格太高，以致虧本。1923 年泰益號運來的丁香賣不出去，金義興只好請旭商店代賣。參見林玉茹主編，《臺南商業文書：金義興號（一）（1907-1915）》，頁 80-83；〈臺南金義興商行書信〉，識別號：T1001_02_15_013，掃描編號：T1001_12431，1923 年 12 月 25 日。

⁸³ 臺商是金義興、振承、永茂、金源益、永發、宜安、長美、鼎興榮、成利。日商有旭商會、酒井商店、矢頃商店、平田商店、西村商店、小村商店、桑田商店、勝尾商店、鳥井商店、丸三商會。參見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編，《本島ニ於ケル海產物：生産、輸、移出入》，頁 194。

⁸⁴ 林玉茹主編，《臺南商業文書：金義興號（一）（1907-1915）》，頁 332-335、340-3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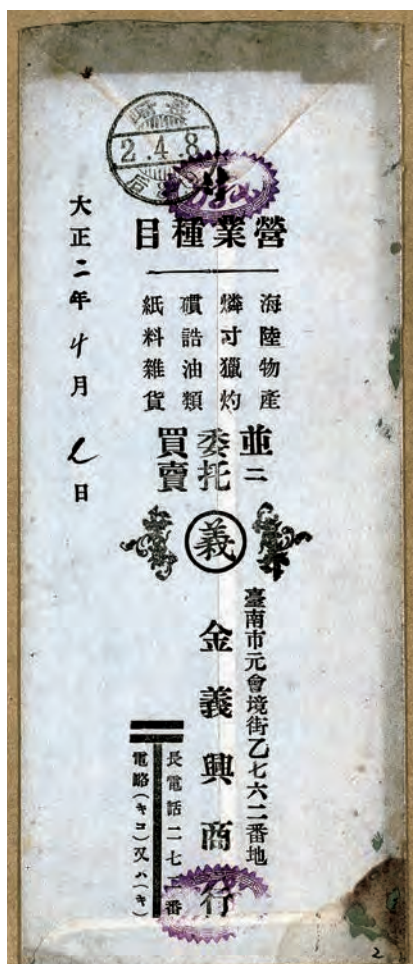


圖4 1913年4月營業項目
變更並增委託販賣

資料來源：〈臺南金義興商行書信〉，
識別號：T1001_02_15_013。

正由於金義興號會從神戶、函館、大阪、下關等地移入海陸產，進口網絡多源，長崎泰益號並非唯一路徑，導致需求選擇彈性逐漸提高。不過，元會境街時期的金義興號卻與長崎泰益號維持最密切的關係，具有泰益號所建構臺南網絡核心仲介商號的特徵。首先，1910年11月，泰益號請王汝禎幫忙調查臺南商號海產的買賣行情。作為魷魚批發商的王汝禎即跟陳世望建議，由長崎日商川原屋城島勝助移入的魷魚品質比泰益號的二號魷魚好，⁸⁵ 市面上更好銷售。泰益號如果要在臺灣競爭海產，必須與源頭商議調降價格。或許王汝禎因此取得陳世望的信任，1911年3月，金義興號進一步協助調查臺南大鹽乾魚批發商福勝號和瑞珠號，不僅報告福勝號可能會倒閉，更協助索討債款。瑞珠號則因虧損極為嚴重，也交由王汝禎調解。⁸⁶ 4月，泰益號蔡承潤到臺南訪查，指出金義興號經營花生、豆油、罐頭、海味、鹽貨，雖是小店，商業信用妥當。⁸⁷ 在信用確認之下，5月，陳世望詢問王汝禎是否願意運糖到長崎交換。王汝禎卻認為糖業已經完全由日本人包辦，臺灣人僅是買辦而已，仍然堅持單向的海陸產雜貨輸入商角色。⁸⁸ 由此可見，陳世望試圖把雙方的交

⁸⁵ 由1911年10月15日宜安商行商業書信可知，王汝禎所指的城島就是長崎在地江戶町的川原屋貿易商城島勝助。參見〈臺南宜安商行書信〉，《長崎泰益號文書》，典藏號：T1001_11925，1911年10月15日；第二回關西九州府縣聯合水產共進會長崎縣協贊會編，《長崎縣紀要》（長崎：該會，1907），頁215、廣告頁31。

⁸⁶ 林玉茹主編，《臺南商業文書：金義興號（一）（1907-1915）》，頁120-133。

⁸⁷ 辛德蘭，〈長崎華商泰益號與臺南地區商號的貿易活動（1901-1938）〉，頁334。

⁸⁸ 林玉茹主編，《臺南商業文書：金義興號（一）（1907-1915）》，頁136-139。

易關係轉換成臺北陳源順般的雙向交換商品，不僅得以擴大貿易規模，還能建立更穩固的合作關係，但卻未能如願。

雖然無法展開雙向委託貿易，泰益號仍持續委任王汝禎協助處理商務。1911年6月，臺北賣不掉的對洲二魷，由大稻埕陳源順號轉運到臺南，由金義興代賣。由於品質相當不好，王汝禎只好以缸計算賣給小吃攤，反而大獲其利。不過，雙方卻又因為商品品質、報價以及損失攤賠，一再起爭端。談不攏時，只好把鯉乾直接由臺南轉交臺北陳源順號。儘管如此，1912年金義興號已經變成泰益號臺南網絡名副其實的中介商號。1月，大井頭街（今民權路二段）的新春益號初次與陳世望聯繫，要採辦海產應付歲末消費需求。陳世望卻要求必須透過金義興號引介才行。⁸⁹ 這個交易雖然因此而破局，卻顯現金義興號的地位。7月，泰益號派蔡承潤到臺南暫住金義興號店鋪，互相交流配貨和販賣經驗。金義興號也將木耳運交長崎泰益號，協助以較低的稅金報關，再轉口給香港本記號。8月，王汝禎再次將品質非常差的鰻萍脯，透過田中央街（今彰化田中）的批發魚行（魚商問屋）聯益號，賣到內陸的他里霧（今雲林斗南）。12月，又代陳世望將款項繳給金源益號。1913年9月，泰益號為金義興號以安南丸運來明鮑，因王汝禎資金週轉困難而給予付款寬限。金義興號也將泰益號配錯的尖梭脯轉交給旭商店販售。⁹⁰

由上可見，王汝禎非常會做生意，即使貨品不佳，或是競爭激烈，也可以將危機變轉機，大膽地透過不同的行銷方式或向內陸販賣，追求利潤。島內海產批發更已達安平港銷售圈的彰化，⁹¹ 島外則因經由長崎往中國沿海報關有利，⁹² 而建立臺南、長崎以及香港的轉口雜貨關係。其次，由協助泰益號調查或引介臺南商業和商號、代付款項給臺南商號、泰益號職員短暫駐店、泰益號居中轉運金義興號木耳到香港以及給予付款寬限，均呈現金義興號作為泰益號臺南網絡核心中

⁸⁹ 賴澤涵、朱德蘭、市川信愛編，《長崎華商泰益號關係商業書簡資料集 臺南地區商號：1901-1938年》，第52冊，頁10797-10798。

⁹⁰ 林玉茹主編，《臺南商業文書：金義興號（一）（1907-1915）》，頁154-165、202-205、220-248、258-265、290-295。

⁹¹ 北海道廳編，《販路調查報告書（臺灣）》（札幌：北海道廳內務部，1916），頁93。

⁹² 臺商由於直接從香港、廈門以及上海進口藥材或雜貨，稅金較高，而透過泰益號代理報關、轉帳事務。1928年以降泰益號營運衰退期，即透過代轉貨物維持營運。參見辛德蘭，〈長崎華商泰益號與臺南地區商號的貿易活動（1901-1938）〉，頁328。

介商號的特徵。不過，由於長崎港在輪船航運上逐漸出現劣勢，⁹³ 泰益號移入的商品品質經常不佳，或是價格競爭力低，如對洲魷魚受到神戶和長崎日商的競爭，香菇也有神戶和大阪商人直接到臺南販售；加以進口來源的多元化，促使金義興號請泰益號代辦商品較少，反而大多是泰益號委託金義興號代賣海產雜貨。爭端則持續存在。1915年3月，王汝禎甚至跟陳世望說，他們開始找長崎其他商行買海產，報價都比泰益號還要低。他是因為念在舊情，所以要求泰益號改變報價。⁹⁴ 儘管雙方持續為了品質、價格以及損失賠補問題，多方交戰，甚至惡言相向，仍多少間歇交易，1917年1月，王汝禎還幫泰益號代收永發號的款項，⁹⁵ 與泰益號持續維持穩固單向進口委託販賣關係。

泰益號僅是金義興進口供應鏈中的一環，儘管雙方交易更多是攤賠損失，但不影響金義興號的持續壯大。在1916年北海道廳的調查中，臺南重要海產移輸入商有20家，日商已經減少為7家，唯一位在府城邊緣、元會境街的海產雜貨行是金義興號和王汝禎。⁹⁶ 在第一次大戰的景氣中，金義興號生意快速成長，⁹⁷ 繳交的營業稅，更已經名列臺南海產雜貨商第五，僅次於旭商店、永茂、金源益以及越智商店。⁹⁸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日商旭商店拔得頭籌，但在繳營業稅的前20名中，日商僅4家，其他均是中小規模的臺商。臺商顯然以螞蟻雄兵之姿，分食臺南進口海產商業的大餅。

日、臺商人在臺南海產雜貨勢力再次翻轉。這應該是1910年代前後，臺商已經可以使用日語直接與日本本土海產出口商交易。⁹⁹ 如前述，臺南的宜安、永茂以

⁹³ 在日本開港之後，原來壟斷日本對外貿易的長崎港每下愈沉，日本統治臺灣之後，直接航線甚少，需要經過門司轉運。由長崎到門司又要使用火車裝運，促使成本增加，加以品質更難掌控，特別是運輸到臺南路程更迂迴，導致競爭劣勢越趨明顯。參見林玉茹，〈邁向長崎泰益號臺南網絡的核心商號與變奏：文書中的臺南金義興號（1907-1915）〉，收於林玉茹主編，《臺南商業文書：金義興號（一）（1907-1915）》，頁2-31。

⁹⁴ 林玉茹主編，《臺南商業文書：金義興號（一）（1907-1915）》，頁208-219、422-425。

⁹⁵ 〈臺南金義興商行書信〉，掃描編號：T1001_12242，1917年1月29日。

⁹⁶ 北海道廳編，《販路調查報告書（臺灣）》，頁84。同時列王汝禎和金義興號，可能是重複，也可能是為了減少營業稅而用兩個名義登記。

⁹⁷ 王育德、王明理著，吳瑞雲、邱振瑞譯，《台灣獨立運動啟蒙者：王育德自傳暨補記》，頁30。

⁹⁸ 交詢社編，《日本紳士錄21版》，朝鮮臺灣關東州，頁121。

⁹⁹ 1916年進金義興號、後來擔任經理的安平人張玉龍（1897-？），即是日語世代。許佩賢的研究指出，1910年代實業界迫切需要懂日文、受一定程度教育的臺灣人作為經理人才，甚至出現公學校臺灣人教師的離職潮。參見許佩賢，〈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地方青年教師的「發達之路」及其限制：以張式毅的軌跡為中心〉，《新史學》（臺北）24:3（2013年9月），頁145-146。

及振承均透過長崎川原屋的城島勝助進口海產，¹⁰⁰ 金義興則直接與函館日商交易。因此對在日華商的依賴或是在臺日商的競爭優勢，均逐漸降低。另一方面，臺南人直接到神戶開店，建構臺灣與神戶之間的海產雜貨貿易網絡，應是關鍵。王汝禎年少好友、臺南出身的蔡炳煌，早在 1911 年單身至神戶鳥井貿易行任職，1915 年因歐洲戰爭的好景氣，在華商聚集的海岸大道（海岸通）創辦經營海陸產雜貨的怡利公司。每年返鄉一次的蔡炳煌，常跟王汝禎一起去寶美樓、招仙閣、林百貨，¹⁰¹ 自然聯手合作，共同成就各自在神戶和臺南海產雜貨批發商的地位。

除了日本移入網絡的變化，中國海產進口也出現新氣象。儘管輸入臺灣的外國海產，在日本領臺之後逐年減少，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又開始急速增加。其中，華南海產為大宗。¹⁰² 王汝禎應進一步試圖拓展中國進口網絡。除了前述與香港本記的木耳交易之外，1916 年 4-6 月，他即以商業視察名義前往海產主要輸出港口的廈門和福州。¹⁰³ 不過，此際臺商已經開始與函館直接海產貿易，不一定透過神戶或下關商人經手，¹⁰⁴ 臺北和基隆的商人更轉口北海道海產到中國各港，賺取差價，¹⁰⁵ 大獲其利。王汝禎似乎仍堅守進口海產，而沒有進一步發展轉口生意。

總之，元會境街時期的金義興號，已經由海產擴張到陸產批發、委託販賣，奠定全島性海陸產雜貨批發商的地位，銷售圈遠及安平港腹地的彰化地區。營業項目則大致底定，採取多角化經營。從使用商標、店章、英文商號，由海產雜貨批發商擴展為海陸產雜貨輸入商，以及標明委託販賣，均展現王汝禎商業經營的現代性，以及打造出跨國委託貿易網絡的企圖。即使與同時期其他臺南商號及文書比較，也相當突出。另一方面，此期是臺南金義興號與長崎泰益號關係最緊密

¹⁰⁰ 〈臺南宜安商行書信〉，典藏號：T1001_11925，1911 年 10 月 15 日；〈臺南永茂書信〉，《長崎泰益號文書》，典藏號：T1001_11219，1912 年 12 月 22 日；〈臺南振承書信〉，《長崎泰益號文書》，識別號：T1001_02_15_037，掃描編號：T1001_12726，1913 年 6 月 12 日。

¹⁰¹ 王育德、王明理著，吳瑞雲、邱振瑞譯，《台灣獨立運動啟蒙者：王育德自傳暨補記》，頁 154；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該社，1937），頁 147、153。

¹⁰² 王俊昌，〈日治時期臺灣的水產輸出入貿易（1901-1940）〉，收於黃麗生編，《東亞海域與文明交會：港市・商貿・移民・文化傳播》（基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2008），頁 283、表 2；下郡山信吉，〈本島に於ける鹽乾魚の需給狀況〉，《臺灣水產雜誌》（臺北）118（1925 年 11 月），頁 13-14。

¹⁰³ 〈1916 年 4-6 月外國旅券下付表〉、〈1928 年 4-6 月外國旅券下付表〉，《臺灣總督府旅券下付及返納表》，識別號：T1011_03_069、T1011_03_117。

¹⁰⁴ 北海道廳編，《販路調查報告書（臺灣）》，頁 85、146。

¹⁰⁵ 谷ヶ城秀吉，《帝国日本の流通ネットワーク：流通機構の変容と市場の形成》，頁 114-115。

時期，儘管雙方爭論不斷，言語激烈，金義興號仍邁向泰益號臺南網絡的核心中介商號。不過，由於金義興進口網絡由日本向香港、中國拓展，海陸產來源多元，以及雙方爭端不斷，導致交易始終不多，則突顯長崎泰益號組織的惰性¹⁰⁶及華商網絡的脆弱性，值得進一步深入比較探究。

四、南臺灣海陸產巨商

誠如前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景氣中，金義興號快速擴張，王汝禎以元會境街營業場所有點狹隘和偏僻，對顧客並不方便，所以選擇相當繁華的本町（原府城鞋街），興建地號連三號，前、中、後三棟的店屋兼住家，緊鄰辰馬商會。1917年12月落成和遷居，並以日文明信片周知所有往來商家。新屋的前棟是店鋪，2樓是倉庫，罐頭、魷魚以及冬粉推積如山。¹⁰⁷金義興號由邊陲進入府城商業核心地帶，可以發揮聚集經濟效果，吸引來自中國帆船出海（類似船長）、城郊如麻豆買客到店消費，¹⁰⁸生意更上一層樓。除了首次以日文書寫的通告，1920年之後的賀年片均用日文，¹⁰⁹突顯本町時期金義興號的日本化，也展現與始終使用舊曆和中文書寫的華商泰益號的差異，以及直接布局日本帝國經濟圈的企業競爭力。

搬到本町的金義興號，生意更繁盛，1917年所繳營業稅額已經名列海產雜貨商第三。1918年杉野嘉助在《臺灣商工十年史》指出，臺南唯一且交易量最多、最大的海產雜貨商就是王汝禎和旭商店的古瀨大壽。金義興號營業額更高達43萬圓，營業稅946圓，已是開店當時的40倍。¹¹⁰

¹⁰⁶ 泰益號組織的惰性問題，在與臺北陳源順號的交易上，常出現帳款錯誤、電報失誤等等問題，未來值得進一步觀察和討論。

¹⁰⁷ 即本町二丁目丁81之6、7、8號。參見〈臺南金義興商行書信〉，掃描編號：T1001_12346、12347、16513，1917年12月5日、1920年5月2日、1920年5月13日；〈王汝禎戶籍謄本〉；王育德、王明理著，吳瑞雲、邱振瑞譯，《台灣獨立運動啟蒙者：王育德自傳暨補記》，頁30、72。

¹⁰⁸ 〈臺南金義興商行書信〉，掃描編號：T1001_12432、T1001_12473，1924年1月22日、1928年7月12日。

¹⁰⁹ 〈臺南金義興商行書信〉，掃描編號：T1001_16517，1920年1月1日。

¹¹⁰ 杉野嘉助，《臺灣商工十年史》，頁552、563。杉野的觀察，或許有一定偏見，但也突顯王汝禎與日本人良好的關係。

金義興號的迅速崛起，應因其是 1910 年代與函館直接貿易量最大的臺南商號。直至 1919 年，儘管基隆海產移入額已經超過臺南，大量小型臺商加入海產貿易，金義興號仍是臺灣與函館貿易唯一代表性的臺南商人，移入額達 20 萬圓，¹¹¹ 幾乎占營業額的一半，由此可見函館海產對於金義興號的重要性。相對地，根據朱德蘭的統計，1919 年是金義興號與泰益號交易金額最多的一年，達 18,553 圓，¹¹² 但在金義興號高達 40 萬餘圓的營業額中，卻相當微不足道，再次顯現長崎泰益號在金義興號進口商品供應鏈中的地位並不高。

1919 年，王汝禎也與張、蘇姓兩位臺南商人共同去神戶、門司、長崎以及下關訪查，最後還在長崎與陳世望見面，雙方關係稍微改善。¹¹³ 此年，因中國和日本之間山東問題而引發中國和南洋華人抵制日貨運動，臺灣海產對外輸出明顯減少三成。¹¹⁴ 陳世望即詢問王汝禎臺灣市場狀況。王汝禎則指出，主要是香港受衝擊，安平與長崎的貿易不僅源源不斷，還比臺灣其他港口多。¹¹⁵ 不過，由表 1 和表 2 可見，此年臺南海產雜貨商顯然受到重創，繳納的營業稅額大減，金義興號也遽降，排名降到第十七。與長崎泰益號交易最多的一年，卻獲利最少，應該給予王汝禎相當大的教訓。進入 1920 年之後，雙方的交易逐年減少，又為了因應國際情勢萬變的狀況，更促使金義興號營運方針的轉向。

1920 年 8 月，由於臺南金長美號與泰益號關係生變，王汝禎除了協助索討尖鯪脯貨款，泰益號運到打狗的朝鮮白蝦蟬更委託金義興處理。王汝禎只好派店員去打狗港，把貨品運到阿猴廳（屏東）販賣，卻因為基隆和下關進口到打狗和東港倚兌（靠行代賣）的蝦子甚多，行情大壞而滯銷，只好將剩餘的蝦蟬運回臺南販售。¹¹⁶ 金長美代賣海產事件，再次展現島內外跨域而多元的進口海產在南臺灣競爭激烈，儘管王汝禎反應迅速，卻持續與泰益號有所齟齬。最大的問題，仍是長崎泰益號配來的海產價格都比其他地方還高，如對洲魷魚受到函館排魷排擠、

¹¹¹ 谷ヶ城秀吉，《帝国日本の流通ネットワーク：流通機構の変容と市場の形成》，頁 119-120、表 4-4。

¹¹² 辛德蘭，〈長崎華商泰益號與臺南地區商號的貿易活動（1901-1938）〉，頁 329-330、表 7。

¹¹³ 〈臺南金義興商行書信〉，掃描編號：T1001_12308，1919 年 5 月 24 日。

¹¹⁴ 下郡山信吉，〈大正八年中本島水產貿易概況〉，《臺灣水產雜誌》53（1920 年 5 月），頁 31-32。

¹¹⁵ 〈臺南金義興商行書信〉，掃描編號：T1001_12315，1919 年 6 月 26 日。

¹¹⁶ 〈臺南金義興商行書信〉，掃描編號：T1001_12351-12353、T1001_12357，1920 年 6 月 5 日、6 月 10 日、6 月 17 日、8 月 15 日。

表2 1919年臺南海產／雜貨商營業稅稅額排名對照表

排名	個人／商號名稱	經營種類	地址	稅額（圓）
1	張江攀	雜貨商	臺南永樂町二丁目	606
2	鄭新芬	雜貨商	臺南本町三丁目	401
3	嚴成	海產物商	臺南本町三丁目	290
4	施福疇	雜貨商	臺南永樂町二丁目	266
5	黃道宗	油海產物商	臺南本町三丁目	233
6	邱天賜	雜貨商	臺南永樂町二丁目	220
7	李強	雜貨商	臺南大宮町一丁目	214
8	董群鴻	雜貨商	臺南永樂町二丁目	208
9	陳鴻	海產物商	臺南辛一八九番地	200
9	陳標	海產物雜貨商	臺南永樂町二丁目	200
11	村上初三郎	雜貨商	臺南錦町三丁目	190
12	龔塘	海產物商	臺南庚一〇八一番地	154
13	古瀨大壽	海產物商	臺南港町一丁目	157
14	李新發	海產物商	臺南己七四二番地	142
15	郭番	海產物雜貨商	臺南西門町三丁目	140
16	蔡奕誠	雜貨商	臺南西門町三丁目	130
17	王汝禎	海產物雜貨商	臺南高砂町二丁目	111
17	越川半五郎	雜貨商	臺南本町三丁目	111
19	陳郁夫	雜貨商	臺南老松町一丁目	106
20	香川喜太郎	雜貨商	臺南本町三丁目	104
21	詹得棟	海產物商	臺南西門町二丁目	102
22	蕭有源	海產物雜貨商	臺南永樂町一丁目	96

說明：林昀叡製表

資料來源：交詢社編，《日本紳士錄23版》，臺南打狗之部，頁1-12。

鹽鯧魚則有美國運來安平港花旗鯧的比價，加以1920年東京股市崩盤，連帶臺灣景氣不佳，以及從下關直接倚兌的海產增多，金義興號因而很少委託泰益號採辦海產。¹¹⁷ 長崎泰益號進口海產顯然受到日本其他地區和美國的競爭，失去優勢，金義興號在地接受委託販賣更加有利，並能因應景氣的快速變化，而減少主動採買海產，與泰益號交易日益減少。

另一方面，1920年10月，原來委託在臺日商代賣海產的長崎崇記號，因為與金義興號同時遇到杭州丸海難事件而共同向大阪商船會社索賠，之後即開始委託王汝禎代賣海產。即使單向委託貿易模式，從與泰益號交易不斷虧損中學到經

¹¹⁷ 〈臺南金義興商行書信〉，掃描編號：T1001_12338、T1001_12355、T1001_12364，1920年3月4日、7月20日、10月22日。

驗的王汝禎，也會拒絕崇記號配來與泰益號一樣品質不好的鮑魚，而原貨駁返。¹¹⁸ 對長崎海產貿易更大的衝擊是，1920年代臺灣的鹽、乾魚移入港以函館為第一，其次是神戶、關門（下關、門司）、大阪以及橫濱，長崎已經落居劣勢。函館海產則以神戶為中繼地。此外，原來美國和加拿大鹹鯷都經由中國輸入臺灣，1921年改由神戶移入，甚至辦完手續之後直接移入。¹¹⁹ 亦即神戶在移入海產到臺灣扮演更重要角色。1920年，前述神戶怡利公司已在基隆設立代表人（駐在員），由同樣來自臺南的怡利公司職員蔡金池負責；1922年，更獨立在基隆經營利記貿易行。¹²⁰ 在蔡炳煌的帶領之下，儼然形成「臺南幫」的神戶、基隆、臺南海產雜貨貿易網絡。換言之，除了向來神戶、長崎、下關、大阪、函館等海產雜貨行委託金義興號代賣之外，透過臺南同鄉親友網絡，王汝禎已經可以直接經由關係密切的神戶臺商取得進口日本海產，對於長崎泰益號的倚賴更低。

1922年，金義興號正由於從島內外有多元的海產雜貨供應鏈，特別是神戶臺商網絡的建構，加以向泰益號採買始終出現價格太高、品質不佳以及斤重損失等爭端，而逐漸變成泰益號單方委兌。¹²¹ 雙方交易額也遽降為1921年的一半，泰益號更進入營業重編期，配來臺南的海產品質更差，即使委兌，因很難賣出，王汝禎一再指出「實難用神」，甚至要求泰益號必須先匯款項，或是只好將賣不出去的丁香拜託旭商店代賣。1925年之後金義興與泰益號聯繫甚少，僅偶爾請泰益號轉配川耳到上海佑浮行。¹²² 相反地，由表1可見，在與蔡炳煌聯手合作之下，1921年金義興號營業稅額再度排名第三。1922年，相對於臺南地區商店的倒閉

¹¹⁸ 〈臺南金義興商行書信〉，掃描編號：T1001_12363、T1001_12378，1920年10月17日、1921年5月7日。

¹¹⁹ 下郡山信吉，〈大正十年中本島水產貿易概況〉，《臺灣水產雜誌》77（1922年5月），頁27-29；下郡山信吉，〈本島に於ける鹽乾魚の需給狀況〉，頁16-17。

¹²⁰ 〈臺南金義興商行書信〉，掃描編號：T1001_12363、T1001_12376，1920年10月17日、1921年4月10日；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頁147。

¹²¹ 1922年金義興號向泰益號新採辦的螺肉，成本又比佐賀關高見產還貴，無利可圖。王汝禎說螺肉生理微薄，故逐漸縮小生意。參見〈臺南金義興商行書信〉，掃描編號：T1001_12373、12382、12395、12404，1921年3月23日、7月2日，1922年6月12日、12月10日。

¹²² 1925年王汝禎僅發出4封信，1926年僅1封。雙方幾乎進入停止交易狀態。參見辛德蘭，〈長崎華商泰益號與臺南地區商號的貿易活動（1901-1938）〉，表7、頁329-330；〈臺南金義興商行書信〉，掃描編號：T1001_12410、12422、12431、12449，1923年3月10日、10月18日、12月25日，1926年4月29日。

和停業潮，¹²³ 金義興卻躍居臺南第一，營業稅額近 1,500 圓，為歷來最高，早已超越 1917 年以前長期位居首位的日商旭商店。

躍居臺南第一大海產雜貨商的王汝禎，除了開始積極以「儒商」身分參與各種地方公益活動，奠定社會地位和建構社會網絡之外，¹²⁴ 經營方法也有所創新。1922-1934 年，每年以「海產商、金義興商會」或「海陸產、火柴雜貨商金義興商行」以及「海陸產、火柴雜貨、罐頭類進口商金義興商行主王汝禎」等名義，陸續在《臺南新報》刊登廣告。¹²⁵ 很明顯地，1920 年之後，王汝禎已經充分掌握更先進而流傳廣泛的報紙廣告行銷，進一步推升金義興的名聲。

1926 年《臺灣日日新報》報導，王汝禎在日本領臺之後經營海陸產業二十餘年，已經是「巨商」。¹²⁶ 即使 1927 年發生嚴重的昭和金融恐慌，商界受到大衝擊，連臺南的銀行也警告王汝禎注意，善於運籌帷幄的他，都絲毫不受影響，¹²⁷ 仍穩居營業稅額第一。

儘管金義興號與泰益號交易逐漸減少，或許基於交情，1927 年王汝禎又再嘗試採辦對洲明鮑，也因永茂號透過泰益號進口冬粉而詢問行情。最後卻再度因為運來的鮑魚品質比不上香港進口的美國舊金山鮑魚，以至於再度停頓。不過，金義興號仍然持續協助調查與泰益號交易的臺南和臺中商號，¹²⁸ 展現王汝禎的商賈之道。

1928 年 11 月，蔡炳煌由神戶回臺灣視察商況，基於高雄船舶出入頻繁，貨物起卸便利，就跟王汝禎一起籌謀創設利（神戶怡利）興（臺南金義興）公司，聘在基隆經營海產移入有成的鍾金塗為經理，專辦日本本土各地海陸物產及中華

¹²³ 辛德蘭，〈長崎華商泰益號與臺南地區商號的貿易活動（1901-1938）〉，頁 321。

¹²⁴ 如余英時所指出明清以來士商合流，不一定要曾獲得科舉功名才稱儒。參見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頁 161-163。「儒商」更是日本殖民時期常見的用詞。例如，金長泰的黃鶯汀也被稱為「儒而賈者」。參見〈臺南雜俎／觀光不可無記錄〉，《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8 月 18 日，第 5 版。王汝禎作為「儒商」的自覺和信念，在書信中明顯展現，這是其他商號文書幾乎看不到的現象。1923 年之後，王汝禎贊助詩社南社、布施、捐款以及實現「儒商」的各種社會責任，將另文討論。

¹²⁵ 不過，1927-1931 年沒有廣告，1930 年改登利興公司廣告。參見〈廣告〉，《臺南新報》，1922 年 1 月 1 日，第 32 版、1934 年 1 月 1 日，第 11 版。

¹²⁶ 〈為繼母祝嘏〉，《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4 月 3 日，第 4 版。

¹²⁷ 〈臺南金義興商行書信〉，掃描編號：T1001_12450，1927 年 5 月 2 日。

¹²⁸ 〈臺南金義興商行書信〉，掃描編號：T1001_12451-12453，1927 年 5 月 5 日、7 月 12 日、10 月 17 日。

各處雜貨，以及委託販賣。¹²⁹ 王汝禎和蔡炳煌為何要在高雄設立公司，以及向中國發展貿易呢？

如前述，臺灣進口海產的第一大消費市場向來在臺南市，海產批發行最多。1920 年代之後，基隆海產行數逐漸超越臺南，輸入臺灣的海產則由中國往加拿大轉移，1935 年之後俄屬亞洲地區輸入取得優先。¹³⁰ 輸入港口的條件變成是影響進口商營運的重要因素。如同蔡炳煌注意到的，1920 年代下半高雄港已經是南部最繁榮的輪船進出第一大港，¹³¹ 安平港勢卻不斷退化，且以帆船運輸為主，1924 年的貿易額已經微乎其微。¹³² 這也是王汝禎一再強調 1920 年代臺南市況不景氣或商業不振的背景。另一方面，1926 年 4 月，川崎汽船又開闢北海道經上海或朝鮮釜山到基隆、高雄的新航線。¹³³ 先前直接運到安平港的函館海產，因此更易轉往高雄港。1928 年 12 月，王汝禎也跟陳世望說，連神戶各號來的商品都到高雄港碼頭卸貨，而且價格相當競爭。¹³⁴ 因不易在安平港取得商品，又必須搶得南臺灣最大港埠的貿易商機，臺南海產商有必要直接到高雄設立據點。事實上，早在利興公司之前，蕭有源的鼎興隆和郭番的永發號，已經到高雄湊町和新濱町設店面或辦事處（出張所）。高雄海產批發行僅有此 2 家，¹³⁵ 顯然完全控制在臺南商

¹²⁹ 1925 年，鍾金塗是基隆重要海產移入商，在媽祖宮口開張金良興。參見下郡山信吉，〈本島に於ける鹽乾魚の需給狀況〉，頁 24；〈高雄利興公司書信〉，《長崎泰益號文書》，識別號：T1001_02_17_008，掃描編號：T1001_13245，1928 年 11 月 3 日。

¹³⁰ 1901-1915 年中國海產輸入最多，占 68-80%；1920 年代之後加拿大占 56-80%，1935 年之後，俄屬亞洲占 38-92%。參見王俊昌，〈日治時期臺灣的水產輸出入貿易〉，頁 317-318、表 9。

¹³¹ 1915 年安平港占臺灣總體貿易比例僅 3.72%，1920 年 2.5%，1925 年不到 2%，1940 年不到 1%。高雄 1910 年 25%，1920 年之後 34-42%，1943 年 21%。參見鄭智哲，〈日據時期臺灣的海洋貿易政策發展：以大阪商船會社與日本郵船會社的營運為中心〉（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 41、表 2-13。

¹³² 下郡山信吉，〈本島に於ける鹽乾魚の需給狀況（二）〉，《臺灣水產雜誌》119（1925 年 12 月），頁 19。1924 年安平港移入的乾魚和鹹魚只有 41.3 萬圓，僅是前年的一半。參見臺南州編，《臺南州產業狀況 大正十一年至昭和元年》（臺南：該州，1923），頁 126。

¹³³ 國際汽船的姊妹會社川崎汽船於 1926 年 4 月開始北海道、上海以及臺灣之間的南北端線新航路，第一艘船是明大丸先基隆入港，月末從高雄出港。這條航線是以北海道根室為起點，從釧路、室蘭、函館，經裏日本，到上海，再到基隆，以高雄為終點。回航從高雄、基隆，直接入釜山，從小樽，經函館回起點。以五千噸輪船 2 艘，每月兩次往返。參見〈臺灣と北海道 を結ぶ新線 川崎汽船の活躍と其の影響〉，《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3 月 26 日，第 2 版。

¹³⁴ 〈臺南金義興商行書信〉，掃描編號：T1001_12478，1928 年 12 月 16 日。

¹³⁵ 殖產局水產課，〈臺灣海產物取扱業者調査表〉，《臺灣水產雜誌》184（1931 年 5 月），頁 27-28、33-34。

人手中。利興公司雖然較晚加入，卻為了配合高雄港以農產品輸出為主的特徵，¹³⁶ 1929年7月營業類目又增加青果輸出入，同時成為猴錢標火柴的臺灣特約販賣代理店。¹³⁷



圖5 利興公司於《臺南新報》刊登廣告

資料來源：〈利興公司 高雄市新濱町〉，《臺南新報》，1930年1月1日，第43版。擷取自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近代臺灣報刊資料庫」，擷取日期：2026年3月19日。

至於往中國發展雜貨貿易，應與王汝禎的觀察有關。雖然資料零星，但如前述，1910年代和1920年代初期金義興號透過泰益號兩次將川耳轉運到香港或上海。另一方面，在利興公司成立前的1928年3月，王汝禎剛好去上海、福州商業視察。¹³⁸ 在中國的見聞，應讓他看到火柴、肥料以及青果等輸出商機。1930年元旦，即在《臺南新報》為利興公司登廣告，不僅註明商號有菱形中間日文的リ商標，營業內容則是「內外海陸物產雜貨、雜貨、青果輸出入，肥料、燐寸（火柴）並支那貿易委託問屋（批發）」（圖5）。又為了業務擴張，直接在靠近高雄火車站的新濱町（今高雄市鼓山區）蓋店屋，9月落成，10月正式開幕。¹³⁹ 由進口為主轉向進出口貿易，是臺南金義興號與高雄利興公司營業性質上最大的差異。

將事業地盤往高雄擴張，應剛好解決金義興號區位劣勢問題。根據1930年的海產貿易商調查，在三大海產批發城市中，基隆獨占鰲頭，有16家，臺北和臺南均是10家。除了臺北市由日商取勝之外，基隆僅有一家日商，臺南全部為臺商。臺南海產批發行則除了金義興號之外，全部往港町集中。¹⁴⁰ 由此可

¹³⁶ 謝濟澤，〈從打狗到高雄：日治時期高雄港的興築與管理（1895-1945）〉，《臺灣文獻》（南投）62:2（2011年6月），頁231。

¹³⁷ 〈高雄利興公司書信〉，掃描編號：T1001_13244，1934年10月18日。

¹³⁸ 〈1928年4-6月外國旅券下付表〉，《臺灣總督府旅券下付及返納表》，識別號：T1011_03_117。

¹³⁹ 〈利興公司 高雄市新濱町〉，《臺南新報》，1930年1月1日，第43版；〈臺南市實業家王汝禎氏〉，《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9月28日，夕刊第4版。

¹⁴⁰ 殖產局水產課，〈臺灣海產物取扱業者調查表〉，頁27-28、33-34。

見，基隆顯然完全超越臺南，成為臺灣海產批發行重鎮，海產批發業則大多掌控在臺商手中。此時，1910年代以前在臺南引領風騷的日商旭商店卻因為1926年投資失敗破產，改由臺灣人林塗經營。¹⁴¹另一方面，仍堅持在本町開業的王汝禎，透過開設利興公司，得以進軍高雄港，迎合日本帝國圈逐漸擴張的新時局，再創新商機，1930年代之後，營業重心因而逐漸轉向高雄。1931年，像蔡炳煌一般，也讓1916年即雇用、貢獻良多的經理張玉龍到接近港町的永樂町（今臺南中西區）獨立門戶，開張經營海陸物產和罐頭的龍記號，拓展地盤，還以日文通知泰益號等相關客戶；¹⁴²王汝禎的女兒王錦碧則與蔡炳煌三子蔡東興聯姻。蔡東興自神戶商校畢業之後，就輔佐父親打理怡利公司事業。¹⁴³在翁婿聯手之下，王汝禎也奠定了在臺南和高雄營業稅額第一的地位（表1），成為南臺灣海產雜貨巨商。

利興公司設立後，也嘗試與長崎泰益號進行貿易。大概每隔三、四個月，王汝禎或鍾金塗都會寫信給泰益號，詢問眾多海產行情，並指定商品的大小和等級，特別要確認這些商品到高雄港交貨的價格。更一再強調如果價錢划算可以獲利，才會採購。直到一年後，1929年11月，利興公司才訂購熟丁香脯，但還叮囑高雄及南臺灣很熱，不是基隆寒冷可比，貨必須要乾燥，免得血本無歸，不可以草草了事。1930年3月，又一度訂購豬油，卻因報價和匯票問題，聯繫再次停頓。1933年2月，王汝禎指責泰益號配來的大蝦品質不好，又因價格和銀行匯票爭執，雙方交易至此劃下句點。之後，僅是每年以日文明信片，向陳世望賀年，直至1938年。¹⁴⁴由在高雄的利興公司與泰益號的交易過程，非常仔細地叮嚀各項環節，再次突顯從1907年金義興號與泰益號之間同樣問題一再出現，以及泰益號組織的惰性。

¹⁴¹ 〈賭博式的投機又流行〉，《臺灣民報》，1926年6月27日，第4-5版；臺灣新聞社編，《臺灣實業名鑑 第一輯》（臺中：該社，1934），頁206。

¹⁴² 1930年，張玉龍已是經理人。金義興號交易的銀行，包括臺灣銀行、三十四銀行、臺灣商工銀行、彰化銀行。參見大日本商工會編，《大日本商工錄 昭和五年版》，臺灣，頁145；〈王汝禎戶籍謄本〉；〈臺南金義興商行書信〉，掃描編號：T1001_12487，1931年2月8日。

¹⁴³ 〈王汝禎戶籍謄本〉；王育德、王明理著，吳瑞雲、邱振瑞譯，《台灣獨立運動啟蒙者：王育德自傳暨補記》，頁19-20；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頁153。

¹⁴⁴ 〈高雄利興公司書信〉，掃描編號：T1001_17258-17260，1936年1月1日、1937年1月1日、1938年1月1日。

在臺南的金義興商行也是類似遭遇。受到營業場所往高雄擴張，1930 年之後與泰益號之間少有交易，直至 1932 年才又曇花一現。這一年 10 月，王汝禎寫信給陳世望說明，1931 年金義興號營業規模縮小，因此與泰益號也「通信久絕」，現在打算重新擴張，請泰益號像之前那樣回報各項行情。這樣的轉變，是因為王汝禎的養子長男王淵源（1916-1933）即將於 1933 年從商業學校畢業，打算大幅擴張生意。同年 3 月，王汝禎還派遣金義興商行的經理（支配人）方啟明、高雄利興公司經理張金鐘兩人，去神戶和長崎視察商工業。也因此，生意更加興隆，連朝鮮、大阪、廣島的商號以及神戶的怡利公司和佐野商店都將魚脯、干貝、大蝦、香菇、罐頭等貨物運來委託販售。委託商品則以鹹魚最多。相較之下，泰益號報來的各項商品行情，卻不太划算，蚵乾和鯉乾在臺南更沒有銷路。王汝禎直言，在不景氣時期，販賣商品更須謹慎，不然很危險，臺南已經有多家商店關閉。¹⁴⁵總之，由於王汝禎可以取得來自日本帝國圈域的各種海產，更特選內地各大會社工廠製造全島最暢銷的蠔螺罐頭（圖 6），突顯對長崎海產需求選擇彈性高，又不太具有價格競爭力，王汝禎即使想要重振長崎貿易，似乎也徒勞無功。1933 年 12 月，王淵源又猝逝，導致此後也如利興公司一般，僅每年發信賀年，直至 1938 年。¹⁴⁶



圖 6 1930 年代金益興號在臺灣全島暢銷的蠔螺罐頭

資料來源：郭婷玉博士私人收藏

¹⁴⁵ 〈臺南金義興商行書信〉，掃描編號：T1001_12488，1932 年 10 月 12 日。

¹⁴⁶ 〈王汝禎戶籍謄本〉；〈臺南金義興商行書信〉，掃描編號：T1001_16524-16527，1933 年 12 月 25 日、1936 年 1 月 1 日、1937 年 1 月 1 日、1938 年 1 月 1 日。

退出長崎泰益號網絡，並沒有影響王汝禎的南臺灣海產雜貨霸業，雖然受到景氣影響，高雄和臺南營業稅額無法再超過 1920 年代的榮景，但是他仍坐穩繳稅第一寶座。1936 年除夕，金義興號「家長」（大掌櫃）郭燦杯說，單他所掌管的帳簿就有 30 萬圓。¹⁴⁷ 事實上，除了海產雜貨批發行的經營，王汝禎也擅長投資。1919 年起，即參加臺灣製鹽株式會社發起人會，購買 30 股股票，直到 1943 年每年獲得股息 72 圓。1921 年，又投資臺灣銀行；1926 年，新任 1914 年成立的信用組合臺南興信社理事，1939 年擔任監事。1925-1941 年，也投資 1911 年由臺南三郊組合成員洪采惠、謝群我等創立的大舞臺，1933 年擔任董事。¹⁴⁸ 雖然資料不足，但 1936 年王汝禎已經建構全島及日本本土、帝國圈內朝鮮和滿洲的販賣圈，不僅是全島「屈指」可數的海產商，也是鷺印煉乳公司代表、大舞臺董事、信用組合臺南興信社理事。¹⁴⁹ 搬到本町之後的王汝禎，顯然鴻圖大展，透過多元的投資，不僅擴展本地商貿網絡，1930 年已被稱為實業家，¹⁵⁰ 除了原來的海產雜貨業，也朝向煉乳製造和品牌化，更多元投資製鹽、娛樂、金融等各種事業，持續創造財富。

然而，儘管王汝禎並沒有像谷ヶ城所言，被日商取代，反而臺南商人全面控制南臺灣的海產雜貨批發業，但最後卻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帝國政策而被完全擊倒。1937 年，顯然為了配合戰時產業政策，利興公司取消使用「公司」，變成合資會社利興商行。¹⁵¹ 1942 年，如前述，日本政府實施企業整備令，殖民地臺灣也成立以日本人為幹部的組合，金義興號和利興商行都因而廢業，原來非常興盛的家業「頓時蕭條」。王汝禎只好把所有的 60 間房產脫手，以熬過戰時日子。¹⁵²

整體而言，1920 年之後，相對於臺北海產雜貨批發業逐漸由日商取得優勢，基隆和臺南的臺商卻以螞蟻雄兵之姿，前仆後繼，取得主導權。金義興號則是少數從創業開始持續成長和擴大的商號。藉由第一次大戰的景氣，他更與到神

¹⁴⁷ 王育德、王明理著，吳瑞雲、邱振瑞譯，《台灣獨立運動啟蒙者：王育德自傳暨補記》，頁 44。

¹⁴⁸ 〈臺灣製鹽株式會社定款〉，《臺灣鹽業》（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6-100073-086；〈興信社組合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1 月 27 日，夕刊第 1 版；帝國興信所編，《帝國銀行會社要錄 第 21 版》（東京：該所，1933），頁 18。

¹⁴⁹ 中西利八，《新日本人物大系》（東京：東方經濟學會出版部，1936），頁 499。

¹⁵⁰ 〈臺南市實業家王汝禎氏〉，《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9 月 28 日，夕刊第 4 版。

¹⁵¹ 〈高雄利興公司書信〉，掃描編號：T1001_17259，1937 年 1 月 1 日。

¹⁵² 王育德、王明理著，吳瑞雲、邱振瑞譯，《台灣獨立運動啟蒙者：王育德自傳暨補記》，頁 14。

戶發展的臺南商人蔡炳煌聯手，打造出臺南與神戶直接貿易的利基。之後，更隨著高雄港取代安平港成為南臺灣海產輸入第一大港，而共同出資在新濱町成立利興公司，王汝禎的營業重心也逐漸往高雄港轉移，進一步奠定他成為南臺灣最大海產雜貨巨商的地位。相對地，長崎泰益號卻逐漸進入營運消退期，王汝禎儘管幾次試圖重振與泰益號的交易，都因為來自帝國圈內進口網絡的擴張，導致海產雜貨進口需求選擇彈性高，而對泰益號的依賴極低，最後於 1933 年退出長崎泰益號網絡。

五、結論

綜合上述，王汝禎出身科舉家族的弱房，14 歲因家逢變故、又適逢臺灣割讓給日本，只能放棄家學淵源，到姻親劉瑞山經營的和源號擔任學徒。1902 年 8 月在府城大東門邊大人廟街設立金義興號，經營海產雜貨業。隨著營業規模的擴張，1910 年搬遷到元會境街和源號舊店鋪，1917 年底受益於第一次大戰的景氣，進軍商業核心地帶的本町。由邊緣進到核心經商，儘管海產雜貨業競爭激烈，又遭逢中國、日本政治經濟關係的一再變化，卻鴻圖大展，由小雜貨商晉升為南臺灣巨商。相對於泰益號營業的消頹、在地其他臺灣和日本大海產批發雜貨行的殞落，王汝禎卻不斷擴展貿易網絡和商品邊界，1930 年代已經是全島數一數二的海產雜貨貿易商，而充分展現遊走在中國和日本帝國勢力夾縫之間殖民地商人的商業韌性。他的成功，更呈現臺灣殖民商業史的重要意義。

首先，由於一家兩舉人，一出生就背負著「舍」的榮譽，少年王汝禎請求後母不要改嫁，即反映他來自科舉家族的自覺。從 1910 年代末以來，日本人編纂的商工史或人士鑑，常會提到王汝禎出身「科甲之裔」，再度顯現他的「儒商」意識及背後夾帶的文化資本，不僅得以擴展在地臺商網絡，也獲得日商旭商店的媒介，1910 年代成為臺南海產批發行與函館直接貿易的代表性商人。谷ヶ城忽略在臺日商在地居住一久，也必須融入地方社會，而與臺商合作，不一定僅有競爭關係。

其次，原來僅是在地小雜貨商的王汝禎，鑒於臺南市是進口海產的第一大消費市場，有必要參與進口貿易。在日本領臺之初，洞察先機的臺灣海產商都打破晚清對中國貿易的路徑依賴，而轉向直接透過長期控制日本海產出口的神戶或長崎華商，進行日本海產移入貿易。王汝禎也不例外，最先加入神戶泰益號和長崎泰益號網絡，而大發利市。不過，1910 年代之後，已經逐漸日本化的臺商，不僅能直接與日本人出口商交易，臺南出身的蔡炳煌更進一步至神戶設立海陸產雜貨批發行的怡利公司，逐漸建構神戶、臺南以及基隆之間的貿易網絡，因此對於在日華商的依賴或在臺日商的競爭優勢都日益降低。1920 年代前後，大量小型臺商加入海產貿易，除了臺北之外，基隆和臺南的海產批發業均由臺商主導。海產雜貨批發業顯然突破淙照彥所指出的殖民地本土資本從屬性的困境，成為臺商突圍發展的破口之一，相當展現臺灣企業文化的特色，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究。

第三，金義興號與長崎泰益號從網絡的建立到退場，軌跡最為完整。王汝禎應透過姻親劉瑞山介紹，而與在日華商建立日本海產移入臺南的網絡。1910 年代元會境街時期的金義興號已是長崎泰益號在臺南網絡的核心中介商號，互動最密切。金義興號協助調查臺南商號、泰益號職員短暫進駐、代賣臺北或基隆來的海產、代轉海產到臺北、幫泰益號向臺南商號代付和代收帳款，泰益號甚至給予付款寬限，以及擔任「守門員」，新聯繫的商號須由金義興推薦。即使 1920 年代以後雙方交易減少，1933 年終止，仍持續通信到 1938 年，成為臺南商號中與泰益號往來最久的商號。

另一方面，雖然金義興是長崎泰益號在臺南網絡的代表商號，交易金額名列前茅，但在金義興號的營業額中卻微不足道。1919 年，最高時也僅是與函館貿易額的十分之一，最後更退出網絡，突顯出長崎泰益號所建構的臺南網絡和經濟規模的脆弱性，未來仍值得深入比較研究。

金義興號最後退出長崎泰益號網絡，主要是對泰益號的需求選擇彈性越來越高，除最初的神戶網絡，又持續擴展日本帝國圈內的長崎、下關、函館、大阪、廣島、朝鮮、滿洲委託販賣網絡。正因海產進口網絡多源，對泰益號的依賴降低。加以臺南消費市場出現變化，大量從美國和加拿大進口的鹹魚或舊金山鮑魚取代對洲鮑魚之後，沒有特別具有價格和品質競爭力的長崎海產，是金義興號逐漸疏

離長崎泰益號網絡的關鍵。加以，從 1907 年一開始交易，因海產的價格、品質、運送以及虧損的分擔等種種問題，雙方爭端不斷，不僅顯現泰益號組織的惰性，長崎港則因輪船航線競爭劣勢，逐漸在日本海產移入臺灣中失去優勢，被神戶和函館取代。與臺北大稻埕陳源順號盡力以同鄉和同宗關係維繫的日本華商網絡不同，王汝禎反而不受束縛，又使用新曆、日文書寫，以及利用代表性商品的品牌化，布局臺灣全島和日本帝國圈內環東亞貿易。金義興號顯然比泰益號更能迎合時局，展現跨足華商或日商網絡的非凡競爭力及應對時局景氣劇烈變動的商業韌性。

第四，王汝禎創業之初，獨具慧眼，先以魷魚批發、貝類罐頭為目標，走向品牌化，而避開在地臺南或日本大鹹魚商的競爭。1910 年代，在旭商店介紹下展開與函館直接貿易，才逐漸切入鹽乾魚販賣。1920 年代，鑒於臺灣與中國貿易的復甦，開始涉足轉口香港和上海的雜貨貿易；另一方面，則藉由日本本土大水產會社製造出聞名全島的貝類罐頭。1920 年代起，所繳營業稅已經超越長期位居臺南第一的日商旭商店。又相對於 1928 年之後泰益號進入營運消退期，金義興號卻不斷擴大，甚至因應安平港和高雄港港勢的消長，與臺南出身的神戶怡利公司合資到高雄設立利興公司，進而奠定王汝禎作為南臺灣海產雜貨巨商的地位。

陳來幸雖然注意到臺商以「邦商」身分和在日華商聯手，或是谷ヶ城指出日本化的臺商所建構的作為日本和東亞的中介網絡及展現的競爭力，但卻忽略王汝禎與蔡炳煌之間如何藉由同鄉好友和姻親關係，建立臺南金義興號與神戶怡利公司的海產雜貨貿易聯盟，以及進一步在高雄港合資成立公司，聯合打造出跨界的海產、雜貨、青果、肥料、火柴輸出入貿易基地。換言之，1910 年代之後，臺南商人在臺南和神戶之間所形塑的臺商網絡，不僅導致臺商對在日華商依賴性的降低，也為在臺日商帶來強大挑戰。臺南商人之間的跨域合作，得以在日本和中國政經關係劇烈變動中，不斷調整商業策略，搶食貿易大餅，邁向巨商之列。然而，最終仍因戰爭下帝國政策的強制整合，而被迫結束營業，再度呈現商人常常無法逃離國家體制和政策宰制的歷史。

引用書目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臺南新報》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民報》

《臺灣總督府報》

〈王汝禎戶籍謄本〉。臺南：中西戶政事務所。

〈王藍玉戶籍謄本〉。臺南：中西戶政事務所。

〈王藍石戶籍謄本〉。臺南：中西戶政事務所。

《長崎泰益號文書》，識別號：T1001。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臺灣總督府旅券下付及返納表》，識別號：T1011_01_004、T1011_03_054、T1011_03_058、T1011_03_117。

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臺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09730003、00000126021、090004764、0002620001、00009560030、

00009875015、00009872024、00001022039、00005329012。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臺灣鹽業》，典藏號：006-100073-086。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泰益號臺灣書信總清單〉。

賴澤涵、朱德蘭、市川信愛編，《長崎華商泰益號關係商業書簡資料集 臺南地區商號：1901-1938年》，第46、52冊。（據日本長崎市立博物館影印未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2）。

下郡山信吉

1920 〈大正八年中本島水產貿易概況〉，《臺灣水產雜誌》（臺北）53: 31-32。

1922 〈大正十年中本島水產貿易概況〉，《臺灣水產雜誌》（臺北）77: 27-29。

1925 〈本島に於ける鹽乾魚の需給狀況〉，《臺灣水產雜誌》（臺北）118: 8-19。

1925 〈本島に於ける鹽乾魚の需給狀況（二）〉，《臺灣水產雜誌》（臺北）119: 16-25。

大日本商工會（編）

1925 《大日本商工錄：公認 大正拾四年版》。東京：大日本商工會。

1930 《大日本商工錄 昭和五年版》。東京：大日本商工會。

大日本實業商工會（編）

1932 《大日本實業商工錄 昭和6年版 臺灣》。大阪：大日本實業商工會。

不著撰人、周憲文（編輯）

1962 《臺灣通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3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中西利八

1936 《新日本人物大系》。東京：東方經濟學會出版部。

王育德、王明理（著），吳瑞雲、邱振瑞（譯）

2018 《台灣獨立運動啟蒙者：王育德自傳暨補記》。臺北：前衛出版社。

王俊昌

- 2008 〈日治時期臺灣的水產輸出入貿易（1901-1940）〉，收於黃麗生編，《東亞海域與文明交會：港市・商貿・移民・文化傳播》，頁277-346。基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

北海道廳（編）

- 1916 《販路調査報告書（臺灣）》。札幌：北海道廳內務部。

交詢社（編）

- 1916 《日本紳士錄 21 版》。東京：交詢社。
1917 《日本紳士錄 22 版》。東京：交詢社。
1919 《日本紳士錄 23 版》。東京：交詢社。
1921 《日本紳士錄 26 版》。東京：交詢社。
1922 《日本紳士錄 27 版》。東京：交詢社。

朱德兰

- 2016 《长崎华商：泰昌号、泰益号贸易史（1862-1940）》。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衣若蘭

- 2011 《史学与性别：〈明史·列女传〉与明代女性史之建构》。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吳文星

- 1992 《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

杉野嘉助

- 1919 《臺灣商工十年史》。臺北：杉野嘉助。

谷ヶ城秀吉

- 2012 《帝国日本の流通ネットワーク：流通機構の変容と市場の形成》。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

余英時

- 1987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辛德蘭

- 2012 〈長崎華商泰益號與臺南地區商號的貿易活動（1901-1938）〉，收於海洋史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港口城市與貿易網絡》，頁291-338。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林玉茹

- 2018 〈進口導向：十九世紀臺灣海產的生產與消費〉，《臺灣史研究》（臺北）25(1): 39-100。
2020 〈跨國貿易與文化仲介：跨政權下臺南第一富紳王雪農的出現（1880-1905）〉，《臺灣史研究》（臺北）27(4): 35-82。
2023 〈貿易網絡的創新與挑戰：臺北大稻埕老源順號文書中的社會經濟活動樣態（1901年至1904年）〉，收於林玉茹主編，《臺北大稻埕商業文書：陳源順號（一）（1901-1904）》，頁2-45。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25 〈邁向長崎泰益號臺南網絡的核心商號與變奏：文書中的臺南金義興號（1907-1915）〉，收於林玉茹主編，《臺南商業文書：金義興號（一）（1907-1915）》，頁2-31。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25 〈日俄戰爭影響下臺北商人與日本的貿易：以大稻埕陳源順號為中心〉，《臺灣史研究》（臺北）32(1): 45-82。

林玉茹（主編）

2025 《臺南商業文書：金義興號（一）（1907-1915）》。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林玉茹、劉序楓（編）

2006 《鹿港郊商許志湖家與大陸的貿易文書（1895-1897）》。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林滿紅

1995 〈臺灣與東北間的貿易（1932-194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24 下：653-696。

2001 〈日本殖民時期臺灣與香港經濟關係的變化：亞洲與世界關係調動中之一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36：45-115。

林滿紅（著）、河原林直人（譯）

2007 〈日本の海運力と「僑郷」の紐帯：一九三〇年代の台湾—滿洲間貿易を中心に〉，收於松浦正孝編著，《昭和・アジア主義の実像：帝国日本と台湾・「南洋」・「南支那」》，頁 344-371。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

涂照彦

1975 《日本帝國主義下の台湾》。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品川仁三郎（編）

1918 《世界輸出入大観 大正七年》。神戸：日華新報社。

帝國商工會（編）

1932 《帝國商工錄：全國版分冊 昭和 7 年度 臺灣版》。大阪：帝國商工會。

1934 《帝國商工錄：分冊 昭和 9 年度版 廣島縣、山口縣、鳥取縣、島根縣、臺灣》。大阪：帝國商工會。

1939 《帝國商工信用錄 昭和 14 年度版 臺灣》。大阪：帝國商工會。

帝國興信所（編）

1933 《帝國銀行會社要錄 第 21 版》。東京：帝國興信所。

柯萬榮

1931 《臺南州名士錄》。臺南：臺南州名士錄編纂局。

洪紹洋

2022 《企業、產業與戰爭動員：現代臺灣經濟體系的建立（1910-1950）》。新北：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淺野豐美

2000 〈日本帝国における台湾「本島人」と「清国人」の狭間：国籍選択権と台湾法制〉，《現代台湾研究》（吹田）19：70-86。

堀和生、中村哲（編著）

2010 《日本資本主義與臺灣・朝鮮：帝國主義下的經濟變動》。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第二回關西九州府縣聯合水產共進會長崎縣協贊會（編）

1907 《長崎縣紀要》。長崎：第二回關西九州府縣聯合水產共進會長崎縣協贊會。

許世融

2006 〈關稅與兩岸貿易 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2010 〈戰時體制下的兩岸貿易（1941-1945）〉，《國史館館刊》（臺北）25：73-113。

許佩賢

- 2013 〈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地方青年教師的「發達之路」及其限制：以張式穀的軌跡為中心〉，《新史學》（臺北）24(3): 135-183。

許紫芬

- 2015 《近代中國商人的經營與帳簿：長崎華商經營史的研究》。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來幸

- 2013 〈開港上海における貿易構造の変化と華商：砂糖と海産物を中心に〉，收於森時彦編，《長江流域社会の歴史景觀》，頁3-24。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博信社（編）

- 1929 《大日本帝國商工信用錄 昭和4年》。東京：博信社。

曾立維

- 2018 〈近代通訊與殖民地臺灣：以電報、電話為中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殖產局水產課

- 1931 〈臺灣海產物取扱業者調査表〉，《臺灣水產雜誌》（臺北）184: 26-41。

費絲言

- 1998 《由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節觀念的嚴格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楊永彬

- 1996 〈臺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權的關係：1895年-1905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臺南州（編）

- 1923 《臺南州產業狀況 大正十一年至昭和元年》。臺南：臺南州。

臺南新報社（編）

- 1907 《南部臺灣紳士錄》。臺南：臺南新報社。

臺灣物產協會（編）

- 1927 《昭和二年臺灣商工名錄》。臺北：臺灣物產協會。

臺灣新民報社（編）

- 1937 《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

臺灣新聞社（編）

- 1934 《臺灣實業名鑑 第一輯》。臺中：臺灣新聞社。

鷹取田一郎（編）

- 1916 《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編）

- 1914 《本島ニ於ケル海産物：生産、輸、移出入》。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劉克全

- 2004 《永遠的劉瑞山》。臺南：劉克全。

鄭智哲

- 2003 〈日據時期臺灣的海洋貿易政策發展：以大阪商船會社與日本郵船會社的營運為中心〉。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63 《臺灣私法物權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15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謝濬澤

2011 〈從打狗到高雄：日治時期高雄港的興築與管理（1895-1945）〉，《臺灣文獻》（南投）62(2): 211-244。

〈臺南金義興號製赤貝罐頭商標〉，「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網」，登錄號：2004.028.3169，網址：<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04.028.3169>，下載日期：2026 年 3 月 19 日。

〈臺南金義興號製蝶螺罐頭商標〉，「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網」，登錄號：2004.028.3168，網址：<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04.028.3168>，下載日期：2026 年 3 月 19 日。

Commercial Resilience between the Crack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Imperial Power: The Rise of a Major Merchant of Seafood and Sundry Products in Southern Taiwan (1895-1941)

Yu-ju Lin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Wang Ruzhen, who came from a lineage successful in the Qing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his firm Jinyixing, which maintained the longest-standing ties with the Nagasaki Taiyi firm of any Tainanese business. It seeks to analyze how, amid drastic shifts in Sino-Japanes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he turbulence of an increasingly globalized economy, Jinyixing adjusted its operations; how Wang Ruzhen's status as a merchant evolved; and how he embraced modern managerial practices to meet the demands of a new era. These dynamics reveal the commercial resilience of colonial-era merchants.

This study yields several findings. First, Wang Ruzhen's self-identification as a descendan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degree-holders (*kejia zhiyi*) functioned as a form of cultural capital. It enabled him not only to expand his local Taiwanese mercantile networks but also to secure mediation by Japanese merchants, allowing him to emerge in the 1910s as a representative trader engaged in direct commerce between Tainan seafood wholesalers and Hakodate.

Second, by the 1910s Taiwanese merchants were growing in power and self-sufficiency. Initially, Taiwanese seafood and sundry-goods merchants relied on Kobe- and Nagasaki-based Chinese merchants who had long dominated Japanese seafood exports to conduct direct trade with Japan. As the twentieth century entered its second decade, however, increasingly Japanized Taiwanese merchants could deal directly with Japanese exporters and even establish firms in Kobe themselves, thereby constructing a trade network linking Tainan, Keelung, and Kobe. In doing so, they reduced their dependence

on Chinese merchants residing in Japan and diminished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previously held by Japanese firms operating in Taiwan.

Third, Jinyixing's withdrawal from the Taiyi Tainan network had multiple reasons. It can be attributed, on the one hand, to the diversification of seafood import sources within both global markets and the Japanese imperial sphere; this greatly increased merchants' flexibility in choosing suppliers. On the other hand, Nagasaki's declining competitiveness in maritime transport, combined with organizational inertia within Taiyi, rendered seafood products from Nagasaki uncompetitive in both price and quality.

Fourth, whereas Taiyi entered a period of commercial decline in the 1920s, Tainan merchants established new trade networks and, in response to the shifting fortunes of Anping and Kaohsiung ports, jointly invested in the founding of the Lixing Company in Kaohsiung. Dedicated to transnational import-export trade, this enterprise consolidated Wang Ruzhen's status as a major merchant in southern Taiwan. These developments underscore the fact that Taiwanese merchants were able to adapt to rapidly changing circumstances. Indeed, they did surpass Taiyi in this regard. They demonstrated a distinctive commercial resilience that allowed them to navigate both Chinese and Japanese mercantile networks while simultaneously constructing networks of their own.

Keywords: Jinyixing Firm, Wang Ruzhen, Taiyi Firm, Kobe, Hakodate, Seafood

